

# 喇嘛洞铁工初论

## ——兼议中国慕容鲜卑、朝鲜三国时期和日本古坟时代铁器葬俗的一致性与差异性

万 欣

在人类历史上的铁器时代，作为社会经济和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铁工，即铁制生产工具无疑应是唯一能够代表这种水平的重要遗物。公元3世纪后期至5世纪前期，活动于中国北方辽西地区大凌河流域的慕容鲜卑之所以能够在诸强纷争、十六国林立的历史条件下得以迅速崛起，屡建其国，拥有以完备的铁兵(铁制兵器)和铜铁马具(包括甲骑具装)武装起来的强大铁骑固然是其重要原因之一。然而，维系这一庞大的战争机器正常运转、为其常年征战提供相对稳定的后方支持和可靠的物质保障的另一个更重要的因素，则应是在其社会生产领域中大量铁工的普遍应用。从这一点上说，铁工是当时的慕容氏鲜卑社会所拥有的全部铁器中的重中之重。有关喇嘛洞部分墓葬出土铁工的一般情况已在相关的发掘报告中作过介绍<sup>[1]</sup>，本文拟在这方面再作一下补充说明，并就其中的一些相关问题试作讨论。

### 一 随葬情况及形制考察

除了残破过甚、难辨其个体数量者外，原报告中所列16座墓共出铁器172件，约占随葬器物总数(432件、副、套)的40%，所占比重皆大于陶器(约占6.9%)、铜器(约占34.2%)和金银器(包括其他饰件，约占10.6%)等。其中铁工共计73件<sup>[2]</sup>(农具27件、猎鱼具8、手工工具33件、其他工具5件)，约占铁器总数的42.4%。这些铁工在诸墓中的随葬数量相差较悬殊。其中M266中随葬最多，共11件，M202中随葬最少，仅1件铁斧，平均每墓随葬4.6件。现以其中的M49、M196、M209和M266(即ⅡM49、ⅡM196、ⅡM209和ⅡM266，下同)为例，对这4座墓内随葬铁工的形制逐一考察如下：

M49随葬铁工共6件(图版15, 1)，即

铍 1件。M49:28，铸制。大半残失，仅存的铍尖部分背面中间起脊，两侧刃略弧，正面近尖部具一道纵向凸棱。存高17.2、存宽21.6厘米。

钺 1件。M49:21，铸制，完整。平面为“凹”字形，弧刃，銜口部一侧略残。高9.2、宽13.1厘米；銜口宽0.6—1.5厘米。

斧 1件。M49:20, 铸制, 完整。平面近梯形, 两侧横贯一扁方釜孔, 其中一侧下部外凸成阶状, 使刃部加宽。长13.9、刃宽9.3、背厚2.4厘米; 釜孔长3.6、宽0.6—0.8厘米。

凿 2件。M49:27, 刃部残, 锻制。上部为半封闭式圆釜, 下部为扁四棱体, 存长17.3厘米; 釜口略作长方形, 长2.1、宽1.5厘米。另件(M49:22)与此件同, 但刃部残失, 存长15.3厘米。

削 1件。M49:12, 锻制, 刃略残。直背直刃, 板条状柄。长31.7厘米。

M196随葬铁工共4件(图版15, 2), 即

铲 1件。M196:27, 铸制, 完整。直釜, 釜口为扁方形, 一面有麻织物痕, 两侧有铸缝, 溜肩, 弧刃。高7.9、宽9.2厘米。

镞 1件。M196:34, 铸制, 完整。半闭合式圆釜, 狭长四棱锥体。长27、宽1.2、釜径3.2厘米<sup>[3]</sup>。

三齿叉 1件。M196:24, 锻制, 釜部残。半闭合式圆釜, 三齿作“山”字形, 皆为四棱体。长25.9、三齿展宽7.4、釜径3.8厘米。

削 1件。M196:8, 锻制, 尖部残。背、刃略弧, 板条状柄。存长25.4、最宽3厘米。

M209随葬铁工共8件(图版15, 3), 即

铍 1件。M209:25, 铸制, 完整。平面近三角形, 尖部圆钝, 两侧刃弧, 尾端不平。背面中间起脊, 脊两侧各有一个不规则形孔, 釜口下凹; 正面平, 近尖部起一道纵向短棱, 中部有一个不规则形大孔。高21.4、宽23.4厘米, 三角形釜口, 高3、宽20.4厘米。

钁 1件。M209:26, 铸制, 完整。平面近梯形, 釜口下有两道铸脊, 两侧有铸缝, 弧刃较锐且两端外撇, 长方形釜口。长10、刃宽9.1厘米; 釜口长6、宽2.8厘米。

锤 1件。M209:24, 铸制, 釜口残。形制同锤M49:21。高9.2、宽13.1厘米。

镰 1件。M209:27, 铸制, 完整。弧背弧刃, 尾端卷起出棱, 前端较宽且平直。长15.7、宽2.2—3.3、背厚0.3厘米。

镞 1件。M209:28, 锻制, 完整。上部为半闭合式釜, 下部为四棱尖锥体。长11.6、釜径2—2.5厘米。

凿 1件。锻制, 完整。形制同凿M49:27。长13.5、刃宽2、釜径2—2.8厘米。

削 2件。锻制, 刃部略残。一大一小, 形制同削M49:12。一长(M209:11)29.4、一长(M209:6)14.9厘米。

M266随葬铁工共11件(图版15, 5), 即

铍 2件。皆铸制, 完整。一大一小, 形制皆与铍M209:25相同。其中大者为M266:35, 背面遍布麻布痕, 中脊两侧各有一个近长方形孔, 背面釜口边缘下凹, 正面无棱无孔, 尾端不平。长30.6、宽36.5厘米; 釜口高4.8、宽30.2、深14厘米。小者为M266:36, 背面釜口边缘近“凹”字形, 背面略曲, 尾端平。长25、宽23厘米; 釜口高5.3、宽17厘米。

犁镜 2件。皆铸制, 一大一小。大者为M266:34, 完整, 平面如舌状, 一侧具一直边。正

面内凹，背面外凸，上有四个穿鼻，周边起棱。长39.5、宽28.6、厚14厘米；鼻长3.2、高1.1厘米。小者为M266:42，形制同前，但一侧残失，背面仅存两个穿鼻。长24.4、存宽13.9厘米。

鏊 1件。M266:41，铸造。平面近方形，两侧有铸缝，弧刃略残，刃部两端外撇；长方形釜口，口下具两道凸棱。长10.5、刃宽10厘米；釜口长9、宽4.4厘米。

铲 1件。M266:86，锻制，仅残存釜部。存长4.9、存宽5厘米。

镰 1件。M266:80，锻制，略残，形制同镰M209:27。长13.1、宽2.5、背厚0.5厘米。

镛 1件。M266:39，完整，锻制。形制同镛M209:28，釜口有明显的锤击痕。长16.1、釜径3.6厘米。

斧 1件。M266:38，完整，表面有锻痕，似在铸成后又经过柔化处理 and 锻打。平面近长方形，两侧贯一扁方釜孔，平刃，刃两端外撇，背平。长10.5、刃宽5、背厚2.3厘米；釜孔长3.5、宽0.6厘米。

凿 1件。M266:79，完整，锻制。形制同凿M49:27，长19.3厘米；釜口近长方形，长2.1、宽1.4厘米。

削 1件。残，锻制。M266:13，形制同削M49:12，存长10.9厘米。

以上4座墓葬所出铁工不仅数量较多，而且主要种类齐全，可以视为喇嘛洞墓地所出铁工中的典型代表(表一)。已发表的16座墓葬随葬的主要铁工可分为以下三类十种：

第一类为农具，分五种，计有铍6（包括犁镜2）、鏊2、镛6、铲7、镰10件；

第二类为猎鱼具，分二种，主要是冰镛，计7件；

第三类为木工工具，共四种，计有斧7、铍2、凿7、削18件。

另有三齿叉2件、砍刀1件和用途不明的小件工具若干，暂略去不计。

这些铁工釜内和柄部多有朽木残留，刃部有明显的使用痕迹。如斧(M49:20、M266:38)的刃部因长期磨蚀而圆钝，鏊和削的刃部多有残损(如M266:41、M49:12、M209:11)，在镛的釜部还有因被锤击而变形的现象(M266:39)，可知它们都是曾被长期用于进行生产活动的实用工具。此外，有的铲(如M196:27)、斧(如M49:20)上尚存清晰的麻布痕迹，显系曾经简单的包裹后入葬，表明它们和兵器、马具一样，皆为死者生前所倚重之物。从形制上看，铸制的且在釜口下带有铸脊的鏊、“凹”字形镛和长方形釜口的平刃凿均具有战国时期铁工的特点。此外，在M108、M290和M328等墓内所出铁铲的形制与M196之铲相同，均为铸造，釜口作六角形，圆肩，显系青铜铲的仿制品。这些具有战国时期青铜工具的风格铁工与典型的汉式铍、镰、斧、凿、削并存，并且在“凹”字形镛、斧、铲和凿这类通常为铸制的铁工中也出现了锻制品(如M46的镛、M266的铲)或带有明显锻打痕迹的铸制品(如M266的斧、M49的凿)，表现出汉晋时期铁工系统的一种过渡形态。

值得注意的是在喇嘛洞发掘报告所列16座墓葬中，有6座墓(M46、M49、M60、M209、M266和M363)内的铁工随葬形式较为特殊。从随葬位置和共存情况来看，与其他散置的随葬品不同，除了其中的削一般均置于死者体侧之外，其他铁工多集中置于死者的左足或右足下(即棺内东南

角或西南角，如M46和M363），有的则集中置于铁釜（或钁）内及其下面（如M49、M60和M266），俨然形成了一处“铁工堆积”，这一现象确不多见。本文初步认为：

1. 与这些“铁工堆积”一样置于死者足下或足侧者均为马具和部分兵器（如M49、M101、M202和M266），这种陈放方式或许在作这样一种象征，即在当时的慕容氏鲜卑社会中，兵农一体、耕战结合，经济与军事被置于同等重要的“基础位置”上。

2. 这些铁工同其他马具、兵器及生活用器一样，均为死者生前的实用之物。将这些本可继续使用的各种铁工用来随葬，表明在当时的慕容氏鲜卑社会中已有了较为稳定的铁工来源。而拥有这一来源的最重要的条件就应是对汉代铁官设置故地的占有，这一点或许又是慕容鲜卑采取东征高句丽、南伐冉魏等重大军事行动的主要目的之一。

3. 据研究，随葬劳动工具曾是新石器时代早期墓葬中较为普遍的现象。随着原始社会的氏族公有制经济向阶级社会的私有制经济过渡，这种葬俗又渐趋淡化，表现为随葬的生产工具在数量上由多到少、在种类上由繁到简的变化趋势<sup>[4]</sup>。进入阶级社会后，随着生产资料私有制观念的不断巩固和加强，劳动者对私有的、价格较贵的金属生产工具一般不再轻易用来随葬，而是尽可能地延长其使用寿命——这也许便是除了少数显贵大墓（如河北满城汉墓和江西新干商墓等）之外，在中原地区乃至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先秦和汉晋墓葬中一般很少或不见有金属工具随葬的一个主要原因<sup>[5]</sup>。现今所见大量的各种青铜和铁制生产工具大多发现于城址、居址、窖藏和冶铸遗址中，只有少数是出自墓葬（其中多为筑墓或盗墓者遗弃而非有意随葬），而这些墓葬又多分布在南方的那些缺少矿冶生产、所需铜铁尚依赖境外输入的地区，这确是一个有些耐人寻味的现象<sup>[6]</sup>。与此相似的是，喇嘛洞墓地所在的辽西地区大凌河流域迄今虽尚无相关的铁矿冶遗址发现，却也出现了比较普遍地以铁工随葬的现象，个中原因既有当时社会经济形态方面的（耕战结合的屯田经济），也有军事方面的（对汉置铁官故地的武装占领），更有不容忽视的丧葬意识方面的影响。史载，东汉时期与鲜卑长期相邻共处的乌桓，其“男子能作弓矢鞍勒，锻金铁为兵”，素有以战死为荣、以盛棺入葬为上之俗，即所谓“贵兵死，敛尸有棺”<sup>[7]</sup>。鲜卑与乌桓同俗，二者具有同一的族源关系。有鉴于此，以M266为代表的喇嘛洞墓葬内普遍随葬铁工的现象似乎表明，公元4世纪中叶的中国北方辽西地区的鲜卑社会在进入了以封建私有制为特征的铁器时代之后，在当时以屯田经济养兵且战事频繁的情况下，慕容鲜卑将战死的将士生前所用铁工连同铁兵或铜铁马具等悉数入葬，即是这种“贵兵死”的观念在葬俗上的具体体现。

## 二 铁工配置与组合分析

在16座墓所出三类十种主要工具中，除了M202、M217、M290、M328和M379五座墓之外，其他诸墓均配置铁工4件以上，其中尤以M266的配置最为齐全，共计11件。可以认为，喇嘛洞诸墓内的铁工配置构成了一种基本组合。

按一般的理解，器物组合意为某一遗迹单位内质地相同但种类或形制不同的器物之间相对

固定的共存关系或形式。据此，这里的所谓铁工组合应是指在同一座墓葬内，由两件和两件以上的铁制工具所组成的基本的共存关系，在语义上或与中石器时代石器研究中所使用的“工具套”一词相似<sup>[8]</sup>。如再将若干座墓葬的铁工组合合为一体，则又构成一个复合式的铁工组合，本文姑且将其称为“铁工组合丛”，它所表示的是包括一定数量的墓葬在内的某一墓地(群)的铁工组合<sup>[9]</sup>。本文试将某一铁工组合和由若干个铁工组合构成的铁工组合丛皆以“铁工A·铁工B·铁工C……”的形式来表示。如吉林榆树老河深墓地(中层墓葬)常见的铁工组合为鏃·锛·镰(M15)，或鏃·镰(M56、M129)，或鏃·镰·刀(削)(M14、M115和 M172)，或鏃·锛·刀(削)·锥(M106)，则该墓地的铁工组合丛即可以“鏃·锛·镰·刀(削)·锥”来表示<sup>[10]</sup>。由于该组合丛是由两类(农具和手工工具)五种不同工具组成的，故亦可将其称为“二五型组合丛”。喇嘛洞墓地的基本铁工组合为铲·削(如M108、M196、M328和M379)，或锛·斧(M46、M49、M363)，或铍·鏃·镰·镞·凿·削(如M209、M266)，则该墓地的铁工组合丛即为铍·鏃·锛·铲·镰·镞·斧·铍·凿·削。由于该组合主要是由三类(农具、猎鱼具和手工工具)十种不同工具组成的，故可将其称为“三一〇型组合丛”。若将上述两处墓地的铁工组合丛略作比较，似不难看出公元1至4世纪中叶的中国东北地区铁工系统的演进、变化的一般轨迹。

1. 在二五型组合丛中，锛为“一”字形，刀为环首小刀(削)；而在相对年代较晚的三一〇型组合丛中，锛变为“凹”字形，削则变为可插装木柄之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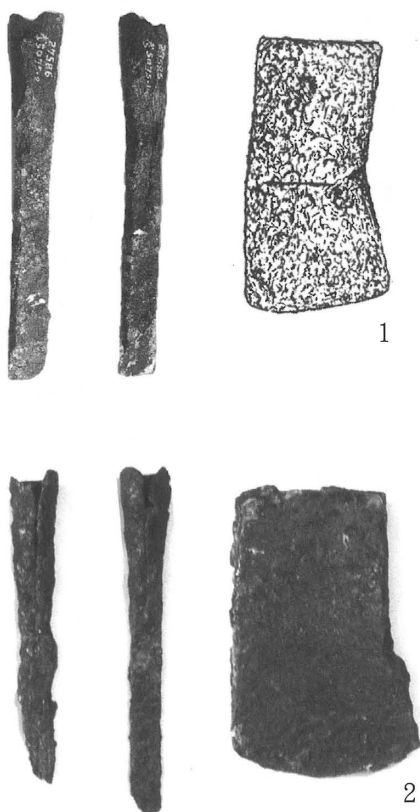
2. 三一〇型组合丛中的铍、镞、斧为二五型组合丛中所未有，鏃、凿虽为两种组合丛所共有，但前者中的鏃的数量明显少于后者，说明鏃的作用(刨土翻地)因铍的出现而被弱化。另在前者中除M60所出之凿与后者中的闭合式铸釜铁凿相同之外，其余均为半闭合式锻釜铁凿，反映出随着生铁柔化和锻制技术水平的不断提高，锻铁工具逐步取代铸铁工具的趋势。

3. 奇怪的是铲。作为一种农具，这种铸制的扁釜圆肩小铲不见于二五型组合丛中，而在三一〇型组合丛中与镰共存者仅有两例(如M108和M217，M226中的锻制小铲除外)。这似在暗示此种商周时期青铜铲的铁质仿制品已与其它铁农具的组合关系渐趋疏远，即将淡出其原来的使用领域。

4. 作为破冰取鱼的工具，铁镞为三一〇型组合丛中所独有，尚不见于其他地区年代相近的铁工丛中。这种猎鱼工具过去在北方地区契丹墓(唐)和辽金墓葬中多有发现，显然应是对十六国时期慕容鲜卑铁镞的直接袭承<sup>[11]</sup>。它多与锛、镰等农具共存，说明冬季猎鱼曾是当时活动于大凌河流域的慕容鲜卑社会农业经济的一个重要补充。

在喇嘛洞报告中，我们曾将该墓地出土的铁工分别同河南洛阳烧沟汉墓和山东章丘汉东平陵故址的铁工作过比较，但这种比较毕竟不是同一遗迹单位内具有共存关系的铁工组合之间的比较，故难免有零散甚至片面之嫌。现以铁工组合为依据，试与以下三个年代相近的铁工出土例再作比较：

1. 冯素弗墓(M1)随葬的铁工：该墓纪年为公元415年。随葬的铁工有扁铲、斧、凿、锯，同喇嘛洞铁工组合相比较，二者共有的铲·斧·凿应是其基本组合<sup>[12]</sup>。该组合中的锻釜铲、扁



图一 铁工比较

1. 冯素弗墓(M1)铁工
2. 喇嘛洞M49铁工

孔斧和四棱体平刃凿分别与喇嘛洞M266铁工组合中的同类铁工相同或相似。二者的凿均为锻制品，但前者的斧为锻制，而后者的斧虽为铸制，却又有锻制的特点，似在铸成后又经过柔化处理和锻打。如再将冯氏墓铁工组合中的铲略去，则其斧·凿组合同样分别为喇嘛洞M46、M49、M60的基本组合相同(图一)。

2. 五女山城铁工，其相对年代为4世纪末至5世纪初。包括两个部分：

一是窖藏(JC)内的铁工。共存的铁工有铲、镰、耙、斧、凿、削、锤、剃、锉、钻等<sup>[13]</sup>。但从线图来看，其中的铲(JC:7)系铸制，形体厚重，应为木工工具——镑；而凿则不具插装木柄的釜，应为石工工具——钎。因此，同喇嘛洞铁工组合相比较，二者共有的镰·斧·削应是其基本组合。这种由弧背弧刃镰、扁孔斧和条形柄削构成的铁工组合同样分别为喇嘛洞M46、M204、M266和M363所具有，二者中的这些铁工的形制不仅相同或相近，而且均为锻制。如果将原来的铲作为镑来考察，则其镰·镑组合又与喇嘛洞M101和M217的基本组合相同。

二是诸房址内的铁工。其基本组合有镰·削·锄(F26)、铲·削(F32)、斧·铲(F33)和镰·镢·凿(F34)，则由此四座房址的铁工组合构成的铁工组合丛为铲·镰

·镢·斧·凿·削，包括三类六种工具，构成三六型铁工组合丛。在该组合的三类六种铁工中，除了凿之外，其余皆与喇嘛洞诸铁工相同或相似。其中F34中的铁工组合(镰·镢·凿)又同为喇嘛洞M46、M60、M209和M266所具有。

3. 河南滏池铁器窖藏铁工：其相对年代为东汉至北魏。所出铁工有铍、犁镜、镰、锄、铲、锄、斧(即I式扁孔斧)共7种，其中的镰相当于镰，它是一种带有釜孔的横釜镰<sup>[14]</sup>。除六角形锄、耒铍等之外，余几乎皆为喇嘛洞铁工所具有，且多为铸制，其组合为铍(犁镜)·镰·锄·铲·斧，这一组合包涵了喇嘛洞M60(锄·斧)M209(铍·镰·锄)、M266{铍(犁镜)·镰·锄·铲·斧}等墓的基本铁工组合，诸铁工的形制也基本相同。但就二者铁工之间的差异而言，则表现在以下三种铁工上：

一是铁铍与犁镜。滏池铁铍平面为弧边三角形，中脊凸出呈棱状，脊两侧无孔，釜作平口式，即正面和背面的釜口边缘平齐。这种铍与河北满城刘胜墓和陕西陇县出土的西汉铁铍的形制相同，其平口式釜的作法似直接从商代青铜铍承袭而来，应为年代较早的一种形制<sup>[15]</sup>。喇嘛洞M266随葬的铁铍和犁镜一大一小共两套，形制相同。其中铍的形状虽与前者一致，但中脊圆

钝，脊两侧各有一孔，釜口作凹口式(即背面的釜口边缘下凹)，这一特征多见于唐宋乃至辽金时期的犁铧上，因而应属较平口式釜铁铧的年代相对为晚的一种的形制<sup>[16]</sup>。二者的犁镜虽皆具穿鼻，但后者均作舌状，与前者的五边形犁镜不同，而更与辽金时期的犁镜相近。这些差异反映了两汉至北魏时期铁铧和铁犁镜的一种过渡形态。

二是铁镢(耜)。渑池铁镢的数量较多，且皆为带有釜孔的横釜镢<sup>[17]</sup>。此外，还有一种直釜镢，原报告将其归为兵器类中的II式斧，其形制与喇嘛洞M209和M266中的耜相同。显然，这种直釜镢和横釜镢应是直接承袭商周时期的同类青铜工具而来的<sup>[18]</sup>。其中直釜镢(耜)与扁孔斧(渑池I式斧、喇嘛洞M49和M266的斧)共存是渑池和喇嘛洞铁工组合的共同特点。这些铁镢(耜)分别与具有汉代风格的喇嘛洞铁铧、犁镜和晚期特征更为明显的渑池铁铧、犁镜共存并行，似可说明在两汉至北魏乃至唐宋铁工系统中，喇嘛洞铁工正处在一个承上启下的位置上。

三是铁铲。渑池铁铲均为铸制的直釜、釜两侧带有铸缝的圆肩小铲。在喇嘛洞16座墓所出的7件铁铲中，除M266的小铲为锻制的之外，其余6件的形制均与渑池铲相同。但从其组合关系上看，与渑池铲共存者均为相对年代较早、形制亦较落后的陈旧铸铁农具，这些农具连同铁铲一起都是被回收寄存后准备毁旧铸新的；而在随葬这类铁铲的6座喇嘛洞墓葬中，只有2座墓内的铁铲与铁镰共存(M108、M217)。这些迹象再次表明，此类铁铲正遭到淘汰，行将退出农业生产领域。

### 三 铁工、铁兵和铁马具：中国慕容氏鲜卑、朝鲜三国时期和日本古坟时代铁器葬俗的一致性与差异性

由喇嘛洞发掘报告中的附表可以看出，铁工具(农具和木工工具)、铁兵器和铁马具构成了喇嘛洞16座墓葬中随葬品的主要的或基本的部分。如果将喇嘛洞铁器放在东亚地区范围内去考察，即将其同三国时期的朝鲜和古坟时代的日本出土的铁器略作比较则不难发现，前者与后两者之间在形制、种类、组合以及所反映的总体文化面貌上具有明显的一致性，因而完全有理由将此三者合为一体，将其视为公元4至6世纪东亚地区的一个独具特色的完整的铁器系统(表二)。因为构成这一铁器系统的主要成分分别是以铧(犁镜)、耜、锤(铲)、镰和斧、铍、凿、削为代表的铁工；以剑、刀、矛、镞为代表的铁兵和以鞍、镫、衔(镗)、(带)扣为代表的铁马具这三类铁器和十六种代表性器物，所以可不妨将其归结为“三铁十六器东亚铁器系统”。该系统内的铁器都是作为随葬品被有意识地置于当时的墓葬或古坟中的，因而其所反映的一定历史条件下的葬俗、葬制以及相关的社会政治、经济和军事方面的文化信息要比那些散见于其他类型的遗址(诸如城址、居址、冶炼址和窖藏等)的铁器更为集中和明显，其研究价值也就更为重要，这一点就是在作为东亚地区铁器发源地的中国中原地区同时期的墓葬所都不曾具有的<sup>[19]</sup>。因此，公元4至6世纪的东亚铁器系统在整个人类社会历史上的铁器时代中占有着重要的

地位。

从表二中所列的具有一定代表性的5座朝鲜古墓葬中随葬的铁工情况来看，铁工基本组合为镰·斧·削(表井里、福泉洞)。其中相对年代较早者为表井里铁工，其组合为铲·镰·斧·铤·凿·削；相对年代较晚者为玉田铁工，其组合为镰·铲·镰·斧·凿。铤的数量均很少，5世纪前半的皇南大冢南坟所出的14件“U”形铤则是最多的一例<sup>[20]</sup>。由这些墓葬的铁工组合所构成的朝鲜三国时期的铁工组合丛为镰·铤·铲·镰和斧·铤·凿·削，共两类八种，即二八型组合丛。

从表二中所列的具有一定代表性的5座日本古坟随葬的铁工情况来看，以大阪黄金冢和冈山金藏山古坟的铁工最具代表性，其组合为镰·铲·镰·手镰和斧·凿·削·锯，这一组合也包括了奈良大和6号坟的诸类铁工(镰·镰·斧·削)。另有阿里山古坟铁工的镰·镰·斧·铤·凿组合和河内野中古坟铁工的铤·镰·斧·削组合。由这些古坟的铁工组合所构成的日本古坟时代的铁工组合丛为镰·铤·铲·镰·手镰和斧·铤·凿·削·锯，共两类十种，即二一〇型组合丛<sup>[21]</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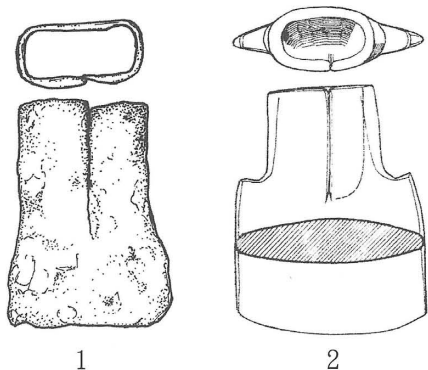
若将中国鲜卑、朝鲜三国和日本古坟铁工组合丛作一综合比较，可知三者之间的共同点是：镰(铤)·铤·铲·镰和斧·铤·凿·削这八种工具是其最基本、最主要的铁工种类，并且均与若干种数量不等的铁兵和铁马具(包括人甲和马甲等)共存，共同反映出公元4至6世纪之间东亚地区铁器系统在总体文化面貌上的一致性。显然，东亚地区铁器系统又是由三个子系统构成的，即中国辽西地区的鲜卑铁系、朝鲜半岛的三国铁系和日本九州地区的古坟铁系。当然，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子系统，中国慕容鲜卑铁系同后两个铁系之间又有着如下一些差别：

首先，在铁兵方面，明显的差别表现的铁铤上。喇嘛洞墓葬所出铁铤不仅数量较少，而且形制也较单一，一般仅为矛式和铲式两种；而后两者的铁铤不仅数量较大，而且形制多样，如古坟时代的铁铤可分为无铤或超短铤族、有铤短身铤和有铤长身铤三大类共十余个形制<sup>[22]</sup>。另

在马具方面，前者中的M202和M266内虽各随葬有1副铁马鞍，但尚不见有铁镫。而在朝鲜三国马具中，表井里墓葬、皇南洞109号坟和皇南大冢南坟中则均有铁镫出土(表二)。此外，日本古坟时代的短甲也表现出与喇嘛洞甲骑具装不同的鲜明的民族风格。鉴于前者与后两者之间在铁兵和铁马具方面的传承关系，可以说，这些差异应是东亚铁器系统在不断发展和变化的过程中所呈现出的一种地域性差异。

其次，在铁工方面，其中主要是中国鲜卑铁工与日本古坟铁工之间的差异，这种差异集中表现在以下两种铁工上：

1、铁斧：作为一种锻釜铁工，日本古坟时代的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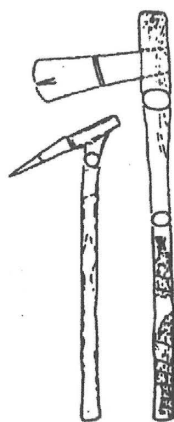
图二 铁工比较

1. 中国辽宁喇嘛洞铁斧(M101:13)
2. 日本河内野中古坟铁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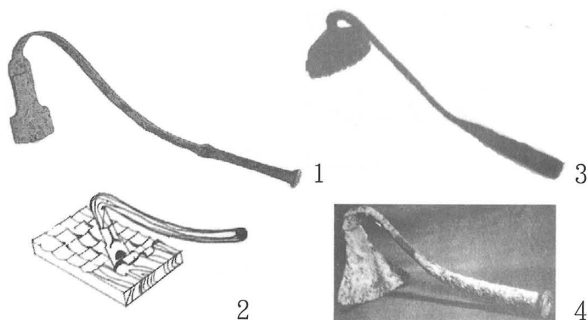
斧的平面一般近长方形或梯形，有的带双肩，銚部为闭合或半闭合式，銚口作椭圆形或C形。这种铁斧的形制虽与喇嘛洞M49、M60和M266等7座墓中所出之斧皆截然不同，但却与出自M101中的一件铁铤相似。此铤的平面近梯形，平刃，銚部虽为闭合式，但仍可见有锻接的接缝(图二、图版15，4)。

据表一中所列，在相关报告中，虽将中国慕容鲜卑、朝鲜三国和日本古坟时代的铁制板状砍斫器同名之为“斧”，但实际上，前者与后二者之间的斧在形制上是有很大差别的：前者之斧虽铸制与锻制兼有，但皆为平背弧刃，并在靠近斧背的两侧之间横贯一个受柄的长方形銚孔，一般将其称为“扁孔斧”。由于这一銚孔的贯通方向与斧刃平行，从而决定了这种斧只能作纵向砍斫之用；而后两者之斧均为锻制，直銚，銚口与斧刃相对，一般将其称为“锻銚铁斧”或“C形袋状铁斧”。显然，这种锻銚铁斧在装柄方式上具有不确定性，即除了可直接插装钩状木柄之外，还可在木柄的前端加装一个木楔，在木楔的下端再装铁斧——或使斧刃与木柄相平行，作斧用；或使斧刃与木柄相垂直，可作铤用。朝鲜乐浪汉墓(西汉后期)和茶户里1号墓(公元前1世纪后半至公元1世纪)中出土的带有木柄的铁斧和铁铤即是其典例，其中的茶户里铁铤即是以钩状木柄的前端直接插入这种铁斧銚内而成的(图三)。在中国，汉代铸制的直銚式铁斧和铁铤形制基本相同，仅大小略有差别，二者的功能同样也是以相关的考古发现为依据来确定的<sup>[23]</sup>。而在日本，迄今似尚无这种装有木柄的锻銚铁斧的实例发现。山梨县中道町大丸山古坟中虽曾出土一件带有铁制曲柄的铁斧(原报告作“有柄铁斧”)，但它已是公元4—5世纪时的遗物了<sup>[24]</sup>。不过令人感到有些惊讶的是，这件铁斧的形制与中国河南洛阳伊川出土的一件西汉时期的曲颈(又称“鹅颈”)铁薨锄十分相似，特别是与中国湖北枣阳出土的一件西汉时期的曲颈铁薨锄相比竟有如出一辙之感(图四)<sup>[25]</sup>！



图三 茶户里1号汉墓出土的铁斧和铁铤

与朝鲜三国和日本古坟时代大量使用这种锻銚铁斧的情况相反，它在汉魏时期的中国却很少出现。据研究，这种锻銚铁斧在河南辉县固围村和辽宁旅顺南山里曾有出土，其年代可溯至公元前4世纪末至前3世纪初的战国晚期，它应是以锻銚技法对铸制的同类铁工的直銚进行模仿的产物<sup>[26]</sup>。在朝鲜半岛，此类铁斧的年代以韩国济州岛龙潭洞遗址所出者为最早，因该铁斧与约当公元前2世纪的无纹陶器共出，故其年代可溯至汉置乐浪等郡县的年代之前<sup>[27]</sup>。而在日



图四 日本铁斧与中国铁薨锄比较

1. 日本山梨县大丸山古坟有柄铁斧
2. 铁斧使用示意
3. 中国河南伊川铁薨锄
4. 中国湖北枣阳铁薨锄

本列岛，则以福冈县吉浦遗址所出者为最早，属弥生时代中期前叶(约当公元前1世纪)遗物<sup>[28]</sup>。因此，无论从空间上还是从时间上看，这种锻釜铁斧都应是自中国中原地区经朝鲜半岛传入日本的。

相比之下，扁孔铁斧的始现年代则要比锻釜铁斧晚得多。河南洛阳烧沟汉墓(西汉中期至东汉晚期)所出者或许是年代较早的一例<sup>[29]</sup>。就其形制特点而言，显然应是铁的冶铸技术较为成熟之后的产物。由于这种铁斧以一个横贯斧体的扁方孔取代了釜部，因而装柄既简便牢固，又更利于砍斫，加之斧体厚重，斧背平整，兼可作锤使用。正是由于具有这些优点，这种扁孔斧自汉代产生以后至近现代，一直被沿用了两千多年，现今所见的木匠用斧和消防用斧的形制与之相比几乎毫无二致，足见其生命力之强。

在喇嘛洞报告所列16座墓中，共有7座墓内随葬有此斧。可以说，这种扁孔斧在公元4世纪的中国鲜卑社会的生产活动中已得到较为普遍的应用，甚至对高句丽的铁工也发生了影响<sup>[30]</sup>。其实，在约当公元前1世纪的朝鲜庆州市九政里遗址所出铁器中就已见有这种扁孔斧与锻釜铁斧共存的例子<sup>[31]</sup>。然而，它最终未能随着锻釜铁斧的东传进入日本，究其原因，或为当时日本的铸铁技术所限，更有可能在那种用(铁)料省、制作工艺较简单、并且可以不同的装柄方式兼作斧或锤两用的锻釜铁斧已得到普遍应用的情况下，当时的日本尚不存在对这种扁孔斧的社会需求。换言之，锻釜铁斧的大量使用是弥生、古坟时代的日本在铁的铸造技术尚不发达、铁料来源还比较有限的历史条件下，为适应和满足本土大量的木作需求，特别是弥生时代木制农具的制作需求所作出的一种必然选择。

2、铁锤：在喇嘛洞报告所列16座墓葬中，计有5座墓内随葬有此器，其中4件均作“凹”字形，铸制。它们虽为典型的汉代风格的农具，但又具有先秦时期同类青铜工具的遗风。这种铁锤在朝鲜半岛早期铁工中所见甚少，仅在虎谷遗址17号居址和乐浪汉墓中曾有少量出土，且均为由中国传人的原器。而当这种“凹”字形铁锤在中国逐渐消失时，在朝鲜半岛却演变出“U”形铁锤，汉城九宜洞所出土的4件铁锤和皇南大冢南坟所出土的14件铁锤即为其例<sup>[32]</sup>。看来，也许是受技术条件所限，三国时期的朝鲜对这种铁锤的使用数量和范围都不大，以至于传入日本者也很少。而弥生时代的日本在受到铸铁技术和铁料来源双重限制的情况下，将锻铁技术同当时普遍使用木制农具的实际相结合，创制了这种与铸制的“凹”字形铁锤形制不同的大量的简单实用的以矩形为主的片状铁锤，使之成为日本古坟铁系中独具特色的铁工之一(表一)。

从形制上看，这种片状铁锤(即日文报告中的“刃先”)实际上是一种以锻制的矩形铁板的两端同向一面弯折而形成的可接纳木锄刃部的“着装部”，其平面形状多为矩形，也有梯形或扇形者。据研究，它在日本至迟出现于公元2世纪初，3世纪时逐渐增多，其制作的技术渊源与弥生时代的“凹”字形青铜锤(即铜刃先)和C形袋状铁斧(即锻釜铁斧)有关<sup>[33]</sup>。然而，就处在一定的文化交流背景下的技术创新的一般过程而言，这种创新既离不开外来技术的影响或启迪，也离不开日本的传统技术基础。在弥生时代，无论是其青铜锤还是其C形袋状铁斧，都与中国金属工具的传入或影响有关。如果说这是矩形片状铁锤据以产生的“外因”的话，那么还应有

一个其所据以产生的“内因”，这个内因不是别的，就是弥生时代大量的木制农具的制作和使用上的需求<sup>[34]</sup>。从九州地区出土的弥生前期至后期铁器种类的变化来看，铁器对石器的取代是从斧、铤、削等木工工具开始的<sup>[35]</sup>。可以说，这种变化也与当时大量的木制农具的制作需求不无关系。因此，如果将这种矩形片状铁锛产生的原因作如下解释或许更为合理，即它是日本弥生时代晚期的工匠在铁料尚不够充足的条件下，为解决大量的木制木铤薄而宽的刃部的“着装”问题，借鉴了袋状铁斧的C形锻釜技术而创造的一种锻铁制品。不难想见，如果将这种矩形片状铁锛视为C形锻釜的一种横向展开形式的话，那么它的“收拢”形式与这种C形锻釜又有多大区别呢？因此，相对于矩形片状铁锛的那种开口扁而宽的“着装部”来说，这种C形锻釜只不过相当于一种开口鼓而窄的“着装部”罢了。

自5世纪以后，古坟时代的日本在继续大量沿用这种矩形片状铁锛的同时，又继朝鲜之后出现了“U”形铁锛，而这种铁锛显然也是受中国汉代“凹”字形铁锛影响的产物，诸多喇嘛洞“凹”字形铁锛的出土也可说明这种影响的持续存在(表一)。有一种观点认为，这种“U”形铁锛在古坟时代中期一经出现，便较快地得到了普及，取代了“一”字形和“凹”字形铁锛，成为当时主要的铁制农具<sup>[36]</sup>。不过，从表二中所列的一些重要古坟出土的铁工来看，似乎并不见有这种普及的迹象。相反，就这些古坟时代中晚期大墓所随葬的铁工而言，那些创制于弥生时代中期的矩形片状的锻制铁锛仍是当时主要的铁刃农具之一。从“U”形铁锛的形制来看，无论是锻制还是铸造，它不仅在制作工艺上要比矩形片状的锻制铁锛复杂得多，而且耗费的铁料也明显多于后者。而在将大量的铁料和先进的锻造技术优先或主要用于军工生产的古坟时代，当时的大和王权或地方豪族是否又会允许大量制作这种与军工生产既争铁料又争功时的生产工具——“U”形铁锛则确是一个值得怀疑的问题。有鉴于此，如果认为这种“U”形铁锛在日本的出现，是三国时期朝鲜的铁器及铁器制作技术传入的结果，确切些说，是原居于朝鲜半岛南部的伽耶诸国的“渡来人”集团(包括其工匠和家族)移居日本后的产物则是一个可以认同的观点<sup>[37]</sup>。既然这种“U”形铁锛的来源在当时的日本还尚属“舶来型”而非“地产型”，那么它是不会具有较快普及并取代其他铁锛的实力的。

附记：本文的写作承蒙日本奈良国立文化财研究所馈赠相关日文发掘报告，辽宁省博物馆姚义田先生帮助译读，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白云翔先生提供相关论文资料，特此一并致谢！

## 注 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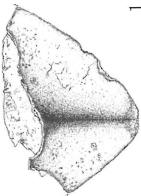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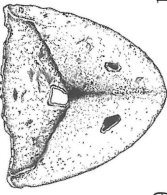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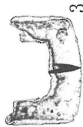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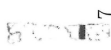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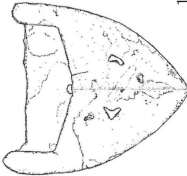








- [1]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辽宁北票喇嘛洞墓地1998年发掘报告》，《考古学报》2004年第2期。
- [2] 喇嘛洞发掘报告中原统计数字为75件，此处以本文重新统计的数字为准。
- [3] 喇嘛洞报告中的所谓“穿”系对其他一些简报中相关名称的沿用，实则应以定名作“镗”为宜。参见[11]中王成生文，现据改。
- [4] 白云翔：《新石器时代墓葬中随葬劳动工具的考察——以黄河中游地区为例》，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考古求知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4月第1版。
- [5] 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满城汉墓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80年10月第一版；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江西新干大洋洲商墓发掘简报》，《文物》1991年第10期
- [6] 由于其他课题研究需要，本人曾对全国125处较为重要的各类古代遗址和墓葬出土古代金属工具的情况作过统计，其中墓葬(群)共46处，约占36%，且大多集中在湘、滇、川、粤四省境内。
- [7] 《后汉书·乌桓鲜卑列传》卷九十。乌桓，又作乌丸，在《三国志·乌丸鲜卑列传》卷三十裴松之注中也有同样记载。
- [8] 工具套(Tool-kit)这一概念是美国“新考古学”的代表人物宾弗(Lewis Binford)提出来的，它指的是为了某种专门的目的而制造的功能整合的成套工具，如采集工具套为尖头木棒、敲(砍)砸器、磨盘和磨棒等。见冯孟钦：《岭南中石器遗存工具套略析》，英德市博物馆等编：《中石器文化及有关问题研讨会论文集》，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12月第1版。与“工具套”不同的是，本文中的“铁工组合”所强调的是同一遗迹单位内的诸随葬工具之间的共存关系。
- [9] “铁工组合丛”一词中的“丛”系本文借鉴文化学上的“文化丛”这一术语而来。所谓文化丛亦称“文化特质丛”、“文化集丛”或“文化复合”，指的是某一组在功能上整合的文化特质因在时空中成为一个单位而持续存在。参见覃光广等主编：《文化学辞典》117页，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8年8月第1版；《社会科学大词典》344页，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89年10月第1版；《辞海》(下)4371页，上海辞书出版社1999年9月第1版。这里的“丛”，在语义上似相当于英语中的“Cluster”。
- [10] 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榆树老河深》，文物出版社1987年4月第一版。
- [11] 张柏忠：《科左后旗呼斯淖契丹墓》(原文中的矛作四棱体，应为镗)，《文物》1983年第9期；苗润华：《巴林右旗老房身金代窖藏》，《辽海文物学刊》1994年第1期；刘谦：《辽宁锦州市张杠村辽墓》，《考古》1984年第11期。王成生：《辽宁朝阳市辽刘承嗣族墓》，《考古》1987年第2期；朝阳地区博物馆：《辽宁朝阳姑营子辽耿氏墓发掘报告》，《考古学集刊》3，1983年。另在吉林德惠后城子金代遗址中也有出土，见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吉林省近十年的文物考古工作》(文中称其为“冰穿”)，《文物考古工作十年》，文物出版社1991年1月第一版。
- [12] 黎瑶渤：《辽宁北票县西官营子北燕冯素弗墓》，《文物》1973年第3期。其中的铲无图，据该报告中描述，应为锻釜铁铲，或与喇嘛洞M266所出之铲相似。凿图和锯图可参见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三燕文物精粹》105页，图131—133，辽宁人民美术出版社2002年1月第1版。
- [13]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五女山城——1996～1999、2003年桓仁五女山城调查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4年6月第一版。
- [14] 李京华：《浑池县发现的古代窖藏铁器》，《文物》1976年第8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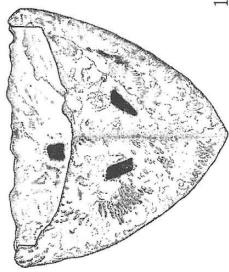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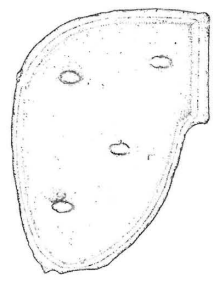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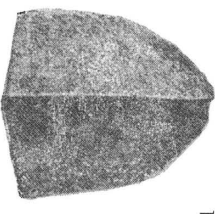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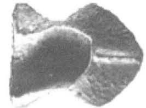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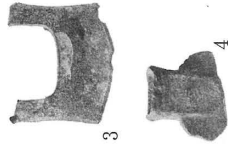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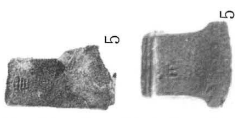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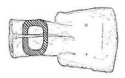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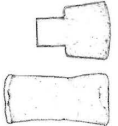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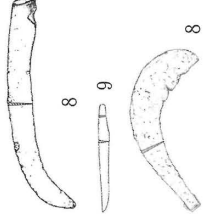

- [15] 见[5]。另见陕西省博物馆等：《陕西省发现的汉代铁铤和镢土》，《文物》1966年第1期。
- [16] 陈文华：《中国农业考古图录》（江西科学技术出版社1994年12月第1版）242页图2—405（河南三门峡唐代铁铤）、243页图2—413（河南洛阳北宋铁铤）、244页图2—423（辽宁阜新辽代铁铤）、246页图2—431（河北丰宁金代铁铤）。
- [17] 同[16]，296页图2—606；297页图2—613。
- [18] 同[16]，289页图2—570（湖北盘龙城青铜耒）、290页图2—575（陕西宝鸡西周青铜耒）。
- [19] 据[6]中的统计资料。
- [20] 王巍：《东亚地区古代铁器及冶铁技术的传播与交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2月第1版。相关朝文报告可参见伊东锡：《三国时代铁器遗物的金属学研究》；《东莱福泉洞古坟群》I，釜山大学校博物馆1983年；赵荣济等：《宜宁礼屯里古坟群》，庆尚大学校博物馆1994年；赵荣济等：《陕川玉田古坟群IIM3号坟》，《庆尚大学校博物馆调查报告》第六辑；文化财管理局：《庆州皇南洞第九十八号古坟（南坟）发掘报告》，1976年。
- [21] 同[20]。相关日文报告可参见梅原末治：《椿井大家古坟》，《京都府文化财调查报告》第22册，1964年；末永亚雄等：《和泉黄金冢古坟》，《日本考古学报告》第5册，1954年；尾崎喜左雄：《后闲天神山古坟》，《前桥市史》第1卷，1971年；北野耕平：《野中アリ山古坟》，《大阪大学文学部国史研究室研究报告》第一册，1964年；北野耕平：《河内野中古坟的研究》，同前，第二册，1976年；末永亚雄等：《宇和奈边陵墓参考地陪冢高冢——大和第6号坟》，《奈良县史迹名胜天然纪念物调查抄报》4，1950年。
- [22] 王巍：《东亚地区古代铁器及冶铁技术的传播与交流》254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2月第1版。
- [23] 参见李京华：《河南古代铁农具》一文中图六一，《农业考古》1984年第2期。
- [24] 东京国立博物馆：《日本の考古》108页插图，1999年。
- [25] 见[16]，275页，图2—532和图2—533。日本铁斧的装柄复原图可参见琦玉县立さきたま资料馆：《さきたま》14页插图，2002年。此外，日文中“有柄铁斧”一词的发音（ゆうへいてつぶ）与汉语十分相近，这又可否算是一个语源上的证据呢？
- [26] 白云翔：《战国秦汉和日本弥生时代的锻釜铁器》，《考古》1993年第5期。
- [27] 同[26]。
- [28] 同[26]。
- [29] 同[26]。另见洛阳区考古发掘队：《洛阳烧沟汉墓》，科学出版社1959年12月第一版。
- [30] 徐家国等：《辽宁抚顺高尔山城发掘简报》，《辽海文物学刊》1987年第2期。
- [31] （朝）李南珪著、赵志文译：《朝鲜半岛初期铁器文化的形成和发展过程》，《华夏考古》1996年第1期。
- [32] 见[22]，97页。
- [33] 白云翔：《弥生时代的铁刃先及相关问题》，《先史学·考古学研究》第2号（1991），筑波大学。
- [34] 刘小燕：《日本弥生时代的农具》，《农业考古》1988年第1期。
- [35] 王巍：《弥生时代铁器及制作技术研究》，《望远集》（下），陕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12月第1版。
- [36] 见[22]，137页。
- [37] 见[22]，139页。

#### 附图出处说明

1. 喇嘛洞出土铁工原图除复印者之外、其余见《考古学报》2004年2期 图一五、一六
2. 河南澠池铁工诸图、见《文物》1976年6期
3. 辽宁五女山铁工诸图、见《五女山城—1996～1999、2003年调查发掘报告》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2004年版、169页图一八〇、240页二四三
4. 朝鲜铁工：见、王巍《东亚地区古代铁器及冶铁技术传播与交流》84页图29、92页图33
5. 日本铁工：见、《河内における古坟の調査》大阪大学文学部国史研究室国史研究报告第一册、一五一页第80图、《河内野中古坟の研究》大阪大学文学部国史研究室国史研究报告第二册、一二八页第71图、一三四页第72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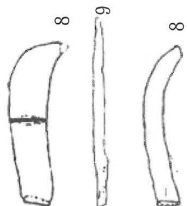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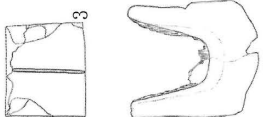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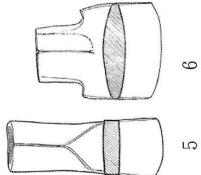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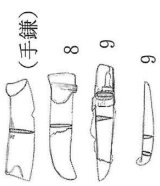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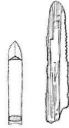
表一 中国喇嘛洞铁工与汉魏、高句丽及朝鲜三国时期、日本古坟时代铁工比较简表

地点	1 铍 (楼犁)	2 覆	3 铺 4 铲	5 斧 6 铍	7 凿	8 镰 9 削 10 叉	11 其他
中国 辽宁 喇嘛 洞地	IM 49 1 		3 	5 	7 	9 	
	IM 196 1 		4 			9  10 	锤 
	IM 209 1 	2 	3 		7 	8  9  9 	锤 
	IM 266 1 	2 	4 	5 	7 	8  9 	犁镜  锤 

地点	1 铍 (耜犁)	2 耒	3 插 4 铲	5 斧 6 斨	7 凿	8 镰 9 削	11 其他
中国辽宁省 喇嘛地 洞墓址 IIM 266	 <p>1</p>						 <p>犁镜</p>
中国河南省 浞池藏 窖	 <p>1</p>  <p>(耜犁)</p>	 <p>2</p>	 <p>3 4</p>	 <p>5 5</p>			 <p>犁镜</p>
中国辽宁省 女营房 五城和 藏址			 <p>4</p>	 <p>5 6</p>	 <p>7</p>	 <p>8 9 8</p>	 <p>簪</p>



续表一

地点	1 铍 (稜形)	2 镞	3 镞 4 铲	5 斧 6 铍	7 凿	8 镰 9 削	11 其他
朝鲜釜山老表井里墓群							
日本大阪古坟、山阿古坟							

表二 中国朝鲜、朝鲜三国和日本古坟时代部分古墓葬、古坟铁器随葬情况简表\*

	出土地点	年代	钺	锛	铲	镰	斧	铍	凿	削	其他	剑	刀	矛	镞	鞍	铎	銜	扣	其他	注
中 国	喇嘛洞II M49	3世纪末	1		1	1	2	1	1	1	铍1	1	1	2	2				1		[1]
	喇嘛洞II M60	同上	1		1	1	1				铍1	1		1							[1]
	喇嘛洞II M101	同上				1	1		1			1						1	2	鞅2(木芯铜片)	[1]
	喇嘛洞II M196	同上		1				1	1	1	铍1、叉1	1		2				1	5		[1]
	喇嘛洞II M202	同上				1						1		1	2			1	4		[1]
	喇嘛洞II M209	同上	1	1		1		1	2	1	铍1、铍1	1	1	2	2						[1]
	喇嘛洞II M217	同上				1	1							1	△			1	6		[1]
	喇嘛洞II M266	同上	1	1	1	1	1	1	1	1	铍2、铍2、	1	1	2	△	2			△	鞅2(木芯铜边)	[1]
	表井里墓葬	4世纪				√	√	√	√	√				√				√			[20]
	皇南洞109号坟	4世纪后半	√			√				1				3	8	28	2	3	4		铍具1、甲冑
皇南大冢南坟	5世纪前半	√	14	√		√			42		铍20、铍1382		42	599	1000	10				铍具4、杏叶	[20]
福泉洞22号坟	5世纪		1			√	1		16		铍20		3	13	42					甲冑、马具	[20]
玉田3号坟	6世纪初	√			√	√	√	√			铍、钎		√				√			马冑、杏叶	[20]
椿井大冢山古坟	3世纪后半				3	1			31			10	7	71	200					甲冑各1	[21]
大阪黄金冢古坟	4世纪后半	√	2	√	7	√	3	6			手镰2、铍1	22	14	1	113					短甲1	[21]
大阪阿里山古坟	5世纪	49			201	√	√	90				√	√	9	1542						[21]
冈山金藏山古坟	同上	√		√	19	√		48	50		手镰30、铍9	√	√	√	63					短甲片	[21]
大阪野中古坟	5世纪后半		11		2	3			2		手镰35、铍4	16	153	3	740					短甲8、付冑8	[21]

\*说明:表中的钺、削分别包括钺、小刀。皇南大冢钺、铲、斧共380件;大阪黄金冢钺、铲、斧共18件;金藏山古坟钺、铲、斧共40件;其余标√者件数均不详,标△者锈残严重,件数未定。

# 喇嘛洞鉄工序論

## ——中国慕容鮮卑、朝鮮三国時代及び日本古墳時代における 鉄器副葬習俗の一致性と相違性——

万 欣

人類史の鉄器時代にあつては、社会経済と生産力の発展の水準を示す重要な指標—鉄工、すなわち鉄製生産用具(農工具)こそ、唯一その水準を代表する重要な遺物と言える。3世紀後半から5世紀前半にかけて、中国北方の遼西地区の大凌河流域において活動していた慕容鮮卑が、列強が激しく争い合い、十六国が群立する歴史条件の下で、なぜ急速に勢力を広げ、度々自民族の国家を興せたのか。彼らが完備した鉄製武器や銅・鉄製馬具(甲騎具装を含む)で武装した強大な騎兵団を擁していたことは、当然その重要な理由として数えられるだろう。しかし、この膨大な軍事物資の正常な運用を維持し、出征する兵団に一年を通じて安定した後方支援と確実な物質的保障を提供し得たもう一つの重要な要素として、その社会の生産分野で大量の鉄製生産用具が広く使われていたことが挙げられる。この点を考えると、鉄製生産用具は、当時の慕容鮮卑の社会が擁していた様々な鉄器の中でも、最も重要なものである。喇嘛洞の一部の墓から出土した鉄製生産用具に関する一般的な状況は、すでに喇嘛洞の発掘報告で紹介されている<sup>1)</sup>。本稿は、それらを更に補って説明し、幾つかの課題について検討を試みるものである。

### 一、副葬の状況と形状に関する考察

16基の墓から出土した鉄器のうち、欠損が著しいため個体数の判定が難しいものを除くと、原報告に記載された鉄器172点は、副葬品総数(432点、対、組)の約40%を占め、土器(約6.9%)、銅器(約34.2%)、金銀器(その他の装飾品を含めて約10.6%)等のどれよりも大きい割合を占める。そのうち鉄製生産用具は73点<sup>2)</sup>(農具27点、狩猟・漁撈具8点、手工具33点、その他の道具5点)で、鉄器総数の約42.4%を占める。こうした鉄製生産用具の副葬数は、それぞれの墓によってかなりの差がある。そのうち副葬数が最も多いのはM266の11点、最も少ないのがM202の鉄斧1点で、各墓の平均は4.6点である。このうちM49、M196、M209、M266(即ちⅡM49、ⅡM196、ⅡM209、ⅡM266で、以下同じ)を例に挙げ、この4基の墓内に副葬されていた鉄製生産用具の形やつくりについて、一つ一つ以下に考察する。

M49には下記6点の鉄製生産用具が副葬されていた(図版15-1)。

犁1点(M49:28)。鑄造で、大半が欠失しており、刃先の部分だけが残っている。裏面の中央に鋤があり、両側の刃が少し弧を描いて、表面の先端付近に縦方向の突帯が施されている。残存高17.2cm、残存幅21.6cm。

鋤先1点(M49:21)。鑄造で、完存している。平面が「凹」字形を呈し、刃が弧を描いており、袋部の片側が少し欠けている。高さ9.2cm、幅13.1cm、袋部の幅0.6~1.5cm。

斧 1 点 (M49 : 20)。鑄造で、完存している。平面が台形に近く、両側横方向に長方形の柄孔が通り、斧身片側の下部が段状に突出し、刃部の幅を広げている。長さ 13.9cm、刃部の幅 9.3cm、背部の厚さ 2.4cm、孔の長さ 3.6cm、孔の幅 0.6~0.8cm。

鑿 2 点。M49 : 27 は、刃部に欠損が見られ、鍛造である。上の方は合わせ目が半ば閉じた断面円形の袋部で、下の方が扁平な四角錐になっている。残存長は 17.3cm あり、袋部が長方形に近く、その長さは 2.1cm、幅が 1.5cm である。別の 1 点 (M49 : 22) もほぼ同様であるが、刃部が欠失しており、残存長は 15.3cm である。

刀子\* 1 点 (M49 : 12)。鍛造品で、刃部が少し欠けている。背部と刃部が真直ぐであり、柄は細長い板状になっている。長さ 31.7cm。

M196 には下記 4 点の鉄製生産用具が副葬されていた (図版 15-2)。

鏟 1 点 (M196 : 27)。鑄造で、完存している。縦型の袋部をもち、差込孔が長方形をしており、片面に麻織物の痕跡が見られる。両側に鑄造の継目があり、なで肩で、刃が弧を描いている。高さ 7.9cm、幅 9.2cm。

穿孔具<sup>3</sup> 1 点 (M196 : 34)。鑄造で、完存している。合わせ目が少し開いた断面円形の袋部をもち、細長い錐状の四角錐になっている。長さ 27cm、幅 1.2cm、袋部の直径 3.2cm。

叉鋏 1 点 (M196 : 24)。鍛造で、袋部が欠けている。合わせ目が半ば閉じた断面円形の袋部をもち、「山」字形になった三つの歯はいずれも四角錐である。長さ 25.9cm、三歯の幅 7.4cm、袋部の直径 3.8cm。

刀子 1 点 (M196 : 8)。鍛造で、先端部が欠けている。背部と刃部が少し弧を描き、柄は細長い板状になっている。残存長 25.4cm、最大幅 3cm。

M209 には下記 8 点の鉄製生産用具が副葬されていた (図版 15-4)。

犁 1 点 (M209 : 25)。鑄造で、完存している。平面が三角形に近く、先端部が丸くて鈍く、両側の刃は弧を描き、基部が平らでない。裏面の中央に鑄があり、鑄の両側には不規則な形の孔が一つずつあり、袋部が凹んでいる。表面は平坦で、先端部付近に縦方向の短い突帯が施され、中央部に不規則な形の大きな孔が一つ開いている。高さ 21.4cm、幅 23.4cm。三角形の差込孔は高さ 3cm、幅 20.4cm。

鏟 1 点 (M209 : 26)。鑄造で、完存している。平面が台形に近く、袋部の下に 2 本の突帯が鑄出されており、両側に鑄造の継目がある。弧を描いた刃は比較的鋭いうえ、両端が外に広がっており、差込孔は長方形になっている。長さ 10cm、刃部の幅 9.1cm。差込孔は長さ 6cm、幅 2.8cm。

鋏先 1 点 (M209 : 24)。鑄造で、袋部に欠損が見られる。形状は上記の鋏 M49 : 21 と同じ。高さ 9.2cm、幅 13.1cm。

鎌 1 点 (M209 : 27)。鑄造で、完存している。背と刃が弧を描いており、基部は巻き上げられており、先端は幅が広く真っ直ぐである。長さ 15.7cm、幅 2.2~3.3cm、背部の厚さ 0.3cm。

穿孔具 1 点 (M209 : 28)。鍛造で、完存している。上の方は合わせ目が少し開いた袋部で、下の方は尖った錐状の四角錐になっている。長さ 11.6cm、袋部の直径 2~2.5cm。

鑿 1 点。鍛造で、完存している。形状は鑿 M49 : 27 と同じ。長さ 13.5cm、刃の幅 2cm、袋部の直径 2~2.8cm。

刀子 2 点。鍛造で、刃部が少し欠けている。大小各 1 点があり、形状は刀子 M49 : 12 と同じ。大きい方 (M209 : 11) は長さ 29.4cm、小さい方 (M209 : 6) は長さ 14.9cm。

M266 には下記 11 点の鉄製生産用具が副葬されていた (図版 15-5)。

犁：2点。いずれも鑄造で、完存している。大小各1点があり、形状はいずれも犁M209：25と同じ。大きい方のM266：35は、裏面一面に麻布の痕跡があり、中央の鑄の両側に一つずつ長方形に近い孔があり、袋部が内側に彎曲している。表面には突帯や孔がなく、基部は平らではない。長さ30.6cm、幅36.5cm。差込孔は高さ4.8cm、幅30.2cm、深さ14cm。小さい方のM266：36は、表面の袋部が「凹」字形で、裏面はやや曲がっており、基部が平らである。長さ25cm、幅23cm。袋部は高さ5.3cm、幅17cm。

泥除2点。いずれも鑄造で、大小各1点がある。大きい方のM266：34は完存しており、平面が舌に似た形を呈し、片側が真直ぐな辺になっている。表面は内側に凹んでおり、裏面は凸面で、そこに四つの環状突起を備え、周囲には突帯がある。長さ39.5cm、幅28.6cm、厚さ14cm。環状突起は長さ3.2cm、高さ1.1cm。小さい方のM266：42は形状がM266：34と同じであるが、片側が欠失しており、裏面の環状突起は二つだけ残っている。長さ24.4cm、残存幅13.9cm。

鑿1点(M266：41)。鑄造。平面が方形に近く、両側に鑄造の継目があって、弧を描いた刃は少し欠けており、刃部の両端が外に広がっている。差込孔は長方形で、その外縁の下に2本の突帯を備えている。長さ10.5cm、刃の幅10cm。差込孔は長さ9cm、幅4.4cm。

鎌1点(M266：86)。鍛造で、袋部だけが残っている。残存長4.9cm、残存幅5cm。

鎌1点(M266：80)。鍛造で、少し欠損しており、形状は鎌M209：27と同じ。長さ13.1cm、幅2.5cm、背部の厚さ0.5cm。

穿孔具1点(M266：39)。完存しており、鍛造である。形状は穿孔具M209：28と同じで、袋部に明らかな鍛打痕が見られる。長さ16.1cm、袋部の直径3.6cm。

斧1点(M266：38)。完存しているが、表面には鍛打痕が見られ、鑄造後に軟化処理と鍛打を経たものと思われる。平面はほぼ長方形で、両側を長方形の孔が貫いている。平らな刃の両端が外に広がっていて、背部も平らである。長さ10.5cm、刃の幅5cm、背部の厚さ2.2cm。

鑿1点(M266：79)。完存しており、鍛造である。形状は鑿M49：27と同じ。長さ19.3cm。差込孔はほぼ長方形で、長さ2.1cm、幅1.4cm。

刀子1点(M266：13)。全体的に欠損しており、鍛造である。形状は刀子M49：12と同じ。残存長10.9cm。

以上4基の墓から出土した鉄製生産用具は、その数が多いうえに主な種類が揃っており、喇嘛洞の墓で発見された鉄製生産用具の典型的な事例と見なせる(表一)。16基の墓にあった副葬品として発表されている主な鉄製生産用具は、以下の3類・10種に分けられる。

第1類の農具は5種に分かれ、犁6点(泥除2点を含む)、鑿2点、鋤先6点、鎌7点、鎌10点などが含まれる。

第2類の狩猟・漁撈用具は2種に分かれ、主に氷用穿孔具で計7点ある。

第3類の木工具は4種に分かれ、斧7点、手斧2点、鑿7点、刀子18点などが含まれる。

これらの他に又鋤2点、砍刀(鉞)1点、及び幾つかの用途不明な小型道具もあるが、ここでは数に入れない。

これらの鉄製生産用具は、袋部の中や柄部に朽ちた木が残っているものも多く、刃部には使用の痕跡が明らかに見られる。例えば、斧(M49：20、M266：38)の刃部は長期にわたる磨耗や腐蝕のため丸く鈍くなり、鑿や刀子(M266：41、M49：12、M209：11など)の刃部は多くが欠損していて、穿孔具(M266：39)の袋部は鍛打によって変形している。よって、これらが生産活動で長期にわたり使用され

てきた実用的な道具であることが分かる。また、一部の鏝(M196:27など)や斧(M49:20など)には麻布の痕跡が明瞭に残っており、簡単に包まれて副葬された様子が伺われるため、それらの鉄製生産用具は、武器や馬具と同じく、死者が生前に大切にしていたものであったことを示している。そして、袋部の下に突帯がある鑿造の鏝、「凹」字形の鋏先、差込孔が長方形で平刃の鑿などの形状は、いずれも戦国時代の鉄製生産用具に見られる特徴をもっている。さらに、M108、M290、M328といった墓から出土した鉄鏝の形状はM196の鏝と同じであり、いずれも鑿造で、すべて差込孔が六角形で丸い肩をもっており、青銅製の鏝を真似て作ったものと思われる。こうした戦国時代の青銅製生産用具に見られる特徴を備えた鉄製生産用具が、典型的な漢式の犁、鎌、斧、鑿、刀子などと相伴しているうえ、「凹」字形の鋏先、斧、鏝、鑿といった通常は鑿造される鉄製生産用具の中にも、鍛造品(例えばM46の鋏先やM266の鏝など)または槌打ちの痕跡が明らかな鑿造品(M266の斧やM49の鑿など)が見受けられる。これは、漢・晋時代における鉄製生産用具の系統の一種の過渡的な形態を表している。

ここで注目すべき点は、喇嘛洞の発掘報告に記載された墓16基のうち6基(M46、M49、M60、M209、M266、M363など)において鉄製生産用具の副葬形式が比較的特殊なことである。つまり、副葬された位置や相伴遺物の状況を見ると、他の副葬品のように周辺に散在しているのとは違い、刀子が死者のすぐ横に置かれているのを除いて、その他の鉄製生産用具の多くは死者の左足または右足に集中して置かれたり(すなわち、棺内の東南角もしくは西南角、例えばM46やM363)、鉄釜(あるいは鉄鍔)の中や下に集中して置かれたりし(例えばM49、M60、M266号)、あたかも「鉄製生産用具の堆積」を形成しているような場合もあるが、このような事例は多くはない。これに関する筆者の基本的な考え方は以下の通りである。

1. これらの「鉄製農具の堆積」と同様に、死者の足下または足の横に置かれているのは、いずれも馬具や武器の一部である(例えば、M49、M101、M202、M266など)。この配置方式は、当時の慕容鮮卑の社会が兵農一体、耕戦結合であり、経済と軍事が同等に重要な「社会の基礎」として位置づけられていた、ということ象徴しているのであろう。

2. これらの鉄製生産用具は、他の馬具、武器、生活用具などと同じく、すべて死者が生前に実際に使用していたものである。これらの引続き使用できる様々な鉄製生産用具を副葬に用いるということは、当時の慕容鮮卑の社会に、すでに鉄製生産用具の安定的な供給源があったことを示している。そうした鉄製生産用具の供給源を確保するうえで最も重要な条件として、漢代に鉄官が置かれた地域を占領することが挙げられる。これは、慕容鮮卑が高句麗への東征や冉魏に対する南伐といった大規模な軍事行動を起こす主な目的の一つであったかも知れない。

3. これまでの研究によると、労働用具の副葬は、新石器時代前期の墓葬で広く見られる。原始社会の氏族による共有制経済が階級社会の私有制経済へ移行するにつれて、このような副葬習俗は次第に廃れていった。それは、副葬される生産用具の数や種類が減っていることに表れている<sup>4</sup>。階級社会に入ってから、生産材の私有という観念が絶えず強まり固定化していくに随い、労働者は私有する貴重な金属製生産用具を軽々しく副葬には供さず、その使用寿命を可能な限り延ばそうとするようになった。これは、地位の高い者が葬られたごく一部の墓(河北省の満城漢墓や江西省の新干商墓など)を除いて、中原地方と長江中下流域にある先秦時代や漢・晋時代の墓葬で金属製の道具があまり副葬されていないことの主たる理由かも知れない<sup>5</sup>。最近、数多く発見されている様々な青銅器や鉄製生産用具の大多数は城址、住居跡、貯蔵穴、冶金・鑿造工房の遺跡などで発見され、ごく一部が墓から出土している(その多

くは、墓の造営者や盗掘者によって遺棄されたもので、意識的に副葬したものではない)。しかも、そうした墓の多くは、冶金に必要な銅や鉄の産出量が少なく、地域外からの移入に頼っていた南方の地域に分布している<sup>6</sup>。これは実に興味深い事実である。これと同じように、喇嘛洞墓地が所在する遼西地区の大凌河流域では、これまで鉄に関係した遺跡が発見されていないにも拘わらず、やはり鉄製生産用具の副葬品が広い範囲で見られている。この理由としては、当時の社会の経済形態に関する要素(兵農合一の屯田制の経済)や軍事に関する要素(漢代に鉄官が置かれた地域の軍事占領)が考えられ、更に埋葬の意識面での影響も無視できない。史料によると、後漢時代に長きにわたって鮮卑と隣り合い共存してきた烏桓について、「大人たちは、弓矢や鞍・轡を作り、銅や鉄を鍛造して武器を作ることができる」と記載されている。元来、烏桓の人は戦死を誉れとし、「戦闘における死を尊ぶ。屍を納めるのに棺を以てす」と史料に記載<sup>7</sup>されている通り、立派な棺に入れて葬るのを高い格式としていた。鮮卑と烏桓は同様の習俗をもち、同じ民族系統に属している。これを考えると、M266を代表とする喇嘛洞の墓葬で、鉄製生産用具がよく副葬されるのは、次のようなことを表していると思われる。つまり、4世紀中頃の中国北方遼西地区における鮮卑の社会では、封建・私有制を特徴とする鉄器時代に入った後、屯田制の経済により兵を養いつつ頻繁に戦争する状況のもと、慕容鮮卑は戦死した将兵を葬るとき、その者が生前に使っていた鉄製生産用具、鉄製武器や銅・鉄製馬具などを一緒に副葬した。すなわち、「兵の死を貴ぶ」観念を埋葬習俗上で具現化したのである。

## 二、鉄製生産用具の副葬と組合せに関する分析

16基の墓から出土した3類・10種の主な生産用具は、M202、M217、M290、M328、M379といった5基の墓を除き、その他の墓でもすべて4点以上が副葬されており、最も種類の揃っているM266では計11点が副葬されていた。喇嘛洞の墓葬群における鉄製生産用具の副葬には、一種の基本的な組合せで構成されていたと考えられる。

一般的に理解されている遺物の組合せとは、ある遺構内に属して、性質は同じでも種類や形状が異なる遺物の間で、相対的に固定した共伴関係または形式のことを言う。ここで述べる鉄製生産用具の組合せとは、同じ墓の中で2点以上の鉄製生産用具により構成される基本的な共伴関係を指し、語義上では中石器時代の石器に関する研究で使われる「ツールキット」という言葉と似ている<sup>8</sup>。さらに、その他幾つかの墓葬における鉄製生産用具の組合せも考え合せると、また複合的な組合せが構成される。本稿では、それをひとまず「鉄製生産用具の組合せ群」と呼び、一定数の墓が含まれる特定の墓(群)における鉄製生産用具の組合せを指すこととする<sup>9</sup>。本稿では、試みに鉄製生産用具の一つの組合せと、幾つかの組合せにより構成される組合せ群を、ともに「生産用具A・生産用具B・生産用具C・・・」という形で表す。例えば、吉林省榆樹県老河深墓地にある中層の鮮卑墓でよく見られる鉄製生産用具の組合せは「鏹・鉄先・鎌」(M15)、「鏹・鎌」(M56、M129)、「鏹・鎌・刀(刀子)」(M14、M115、M172)、「鏹・鉄先・刀(刀子)・錐」(M106)などである。よって、この墓地(群)における鉄製生産用具の組合せ群は「鏹・鉄先・鎌・刀(刀子)・錐」と表せる<sup>10</sup>。また、この組合せ群は2類(農具と手工具)・5種の各道具で構成されているため、「2・5型組合せ群」と呼ぶこともできる。そして、喇嘛洞の墓葬における基本的な鉄製生産用具の組合せは「鏹・刀子」(M108、M196、M328、M379など)、「鉄先・斧」(M46、M49、M363)、「犁・鏹・鎌・穿孔具・鑿・刀子」(M209、M266など)などである。したがって、

喇嘛洞の墓葬における鉄製生産用具の組合せ群は「犁・鏗・鍬先・鏟・鎌・穿孔具・斧・手斧・鑿・刀子」となる。この組合せは主に3類(農具、狩猟・漁撈用具、手工業用具)・10種の各道具で構成されているため、「3・10型組合せ群」とも呼べる。これら2カ所の墓地における鉄製生産用具の組合せ群を比較すると、1世紀から4世紀中頃の中国東北地方で鉄製生産用具の系統が遂げてきた変遷や変化の一般的な軌跡を容易に理解できる。

1. 2・5型組合せ群のうち、鍬先は「一」の字形をしており、刀は環頭小刀(刀子)である。しかし、相対年代が比較的新しい3・10型組合せ群では、鍬先が「凹」字形に、刀子が木柄を装着するものにそれぞれ変わっている。

2. 3・10型組合せ群で見られる犁、穿孔具、斧などは2・5型組合せ群にはまだ含まれていない。鏗と鑿はいずれの組合せ群にも含まれているものの、3・10型における鏗の数は2・5型での数よりも明らかに少ない。これは、鏗の機能(土を掘り返す)が犁の出現によって、取って代わられたことを示している。このほか、3・10型組合せ群に含まれる鑿のうち、M60号墓で出土した鑿のみは、2・5型組合せ群に見られる合わせ目が閉じた鑄造袋部の鉄鑿と同じだが、それ以外の鑿は、すべて合わせ目が閉じていない鍛造袋部の鉄鑿である。つまり、鑄鉄(銑鉄)を軟化処理させたり、鍛造する技術水準の向上にしたがい、鑄造製生産用具が次第に鍛造製生産用具へと代わっていく傾向を反映している。

3. 不思議なのは鏟である。農具の一種であり、この鑄造で長方形の袋部と丸い肩をもつ小さな鏟は、2・5型組合せ群の中に見られず、3・10型組合せ群の中でも鎌と併存している2例が見られるだけなのである(M108、M217、M226などで見られる鍛造された小型の鏟は除く)。おそらく、商・周時代における青銅製の鏟を模倣した鉄鏟は、他の鉄製農具との組合せ関係から次第に疎遠になり、本来それを用いるべき場から姿を消していったのであろう。

4. 氷を砕いて魚を取るための工具である鉄製穿孔具は、3・10型組合せ群にだけ含まれ、年代に近い他地区の鉄製生産用具群では発見されていない。この種の漁撈用具は、かつて中国北方で契丹(唐時代)の墓や遼・金時代の墓から数多く発見されており、明らかに十六国時代に慕容鮮卑が使っていた鉄製穿孔具を直接的に受け継ぐものである<sup>11</sup>。穿孔具の多くは鍬先や鎌といった農具と共存している。これは、大遼河流域で活動していた慕容鮮卑の社会において、農業経済を補うために冬の漁撈が重要であったことを示している。

喇嘛洞の報告で、私たちは、この墓地で出土した鉄製生産用具を、河南省洛陽燒溝漢墓で出土したものや、山東省章丘市にある漢代の東平陵故城で出土したものとそれぞれ比較した。しかしこの比較は、同じ遺構単位内で共存関係にある鉄製生産用具の組合せを比較したものではないため、どうしてもまとまりが取れず、一面的な感が免れ得ない。今回は、鉄製生産用具の組合せに基づき、以下に挙げる3カ所で出土した年代の近い鉄製生産用具を例としながら、改めて比較を試みたい。

1. 馮素弗墓(M1)に副葬されていた鉄製生産用具：この墓の年代は西暦415年である。ここに副葬された鉄製生産用具は、扁平な鏟、斧、鑿、鋸である。喇嘛洞における鉄製生産用具の組合せと比較すると、「鏟・斧・鑿」がその基本的な組合せである<sup>12</sup>。この組合せに含まれる袋部が鍛造された鏟、長方形の孔が貫通した斧、四角錐で平刃の鑿などは、それぞれ喇嘛洞M266での組合せに含まれる同種の鉄製生産用具と同じか類似している。これら二つの墓(馮素弗墓と喇嘛洞)の鑿はともに鍛造製である。馮素弗墓の斧は鍛造で、喇嘛洞の斧は鑄造であるが、鍛造の特徴も備えており、鑄造後に軟化処理や鍛打を経たようである。また、馮氏の墓葬における鉄製生産用具の組合せから鏟を外せば「斧・鑿」とい



う組合せになり、喇嘛洞のM46、M49、M60といった各墓での基本的な組合せと同じになる(図一)。

2. 五女山城の鉄製生産用具：その年代は4世紀末から5世紀初め頃である。以下の二つの部分が含まれる。

その第一は貯蔵穴(JC)に収められた鉄製生産用具である。相伴している鉄製生産用具としては、鏟、鎌、耙(又鍬)、斧、鑿、刀子、槌、剝、鑪、鑽などが挙げられる<sup>13</sup>。ただし、図を見ると、これに含まれる「鏟」(JC:7)は分厚く重い鑄造品のため、木工具の「手斧」とすべきであろう。また、この「鑿」は木柄を装着する袋部を持たないので、石工具の「鉦」とした方がよい。そうして喇嘛洞における鉄製生産用具の組合せと比較すると、その基本的な組合せは「鎌・斧・刀子」となる。このように、背部と刃部が弧を描いた鎌、長方形の孔が貫通した斧、柄の部分が細長い刀子などで構成される組合せは、喇嘛洞のM46、M204、M266、M363といった各墓でもそれぞれ見られる。また、五女山城の貯蔵穴と喇嘛洞の墓にあった鉄製生産用具は、形状が同じか類似しているうえ、いずれも鍛造品である。元は「鏟」とされていたものを「手斧」として考えれば「鎌・手斧」という組合せになり、喇嘛洞のM101やM217での基本的な組合せとも一致する。

第二は、各建物跡で出土した鉄製生産用具である。その基本的な組合せとしては、「鎌・刀子・鋤」(F26)、「鏟・刀子」(F32)、「斧・鏟」(F33)、「鎌・穿孔具・鑿」(F34)などが挙げられる。これら建物跡4カ所における組合せで構成される鉄製生産用具の組合せ群は「(鏟・鎌)・(穿孔具)・(斧・鑿・刀子)」という3・6型の組合せ群である。これら3類・6種の鉄製生産用具は、鑿を除いて、ほとんどが喇嘛洞の各種鉄製生産用具と同じか類似している。また、F34での組合せ(鎌・穿孔具・鑿)は、喇嘛洞のM46、M60、M209、M266といった墓でも見られる。

3. 河南省滎池の鉄器貯蔵穴で出土した鉄製生産用具：この相対年代は後漢代から北魏時代とされている。出土した鉄製生産用具は、犁、泥除、鋤先、鍬、鏟、鋤、斧(長方形の孔が貫通したI式の斧)など計7種類である。このうち鋤先は鍬に相当し、横型の差込孔を備えた鋤である<sup>14</sup>。六角形の鋤や耒耜などを除いて、ほとんどが喇嘛洞でも見られるうえ、鑄造品が多い。その「犁(泥除)・鋤・鍬・鏟・斧」という組合せには、喇嘛洞のM60(鍬先・斧)、M209(犁・鏟・鋤先)、M266{犁(泥除)・鏟・鏟・斧}といった墓での基本的な組合せが含まれ、各鉄製生産用具の形状もほぼ同じである。ただし、下記3種類の鉄製生産用具については、滎池と喇嘛洞で違いが認められる。

第一は鉄犁及び泥除である。滎池の鉄犁は、平面の辺が弧を描いた三角形で、中央部に突帯が施されており、突帯の両側に孔はない。また、袋部が平口式で、表面と裏面の袋部の縁が平行に揃っている。この種の犁は、河北省滿城県の劉勝墓や陝西省隴県で出土した前漢の鉄犁と同じ形状である。その平口式袋部の作り方は商時代の青銅製犁を踏襲したもので、比較的古い年代の形状と判断すべきだろう<sup>15</sup>。喇嘛洞M266に副葬されている鉄犁と泥除は、大きいものと小さいものが一つずつ組合せて計2組あるが、どれも同じような形状をしている。その犁の形状は滎池のものとはほぼ同じだが、中央の突帯は丸く、突帯の両側に孔が一つずつあり、袋部は凹口式になっている(つまり、裏面で袋部の縁が凹んでいる)。この特徴は唐・宋時代から遼・金時代の犁に多く見受けられるため、平口式袋部の鉄犁より新しい年代に属する形状であろう<sup>16</sup>。いずれの泥除にも環状突起が施されているが、喇嘛洞のものはすべて舌状で、五角形をした滎池の泥除とは異なっており、遼・金時代の泥除により近い。これらの違いは、漢代から北魏時代にかけて鉄犁や泥除が変わっていく一種の過渡的な状態を反映したものである。

第二は鉄鋤(鏟)である。滎池の鉄鋤は数が多く、すべて横型の袋部をもつ鋤である<sup>17</sup>。この他にもう

一種類、縦型袋部の鍬があり、原報告では兵器類のⅡ式斧とされていたが、それは喇嘛洞M209やM266の鏝と同じ形状をしている。こうした縦型袋部や横型袋部の鍬は、明らかに商・周時代に使われていた同種の青銅器を直接的に踏襲したものである<sup>18</sup>。そして、縦型袋部の鍬(鏝)と長方形の孔の斧(澠池Ⅰ式斧、喇嘛洞M49やM266の斧)が相伴していることは、澠池と喇嘛洞での組合せに共通した特徴と言える。これらの鉄鍬(鏝)は、それぞれ漢代の様式をもつ喇嘛洞の鉄犁や泥除、及びそれより新しい年代の特徴が顕著な澠池の鉄犁や泥除などと相伴していた。これは、漢代から北魏を経て唐・宋へ至る鉄器の系統において、まさに喇嘛洞の鉄製生産用具が古い時代と新しい時代を繋ぐ位置にあることを示している。

第三は鉄鍬である。澠池の鉄鍬は、いずれも鑄造製であり、縦形袋部の両側に鑄造の継ぎ目があり、丸い肩をもつ小さな鍬である。喇嘛洞の墓16基から出土した鉄鍬7点のうち、M266の小さな鍬だけは鍛造されているが、他の6点は形状が澠池の鍬と同じである。しかし、その組合せ関係を見ると、澠池の鍬と相伴しているのは、いずれも相対年代が比較的早く、形状も後進的な鑄鉄製農具なのである。これらの農具は、鉄鍬とともに回収して集め、また新たに鑄直すためのものであろう。また、喇嘛洞でこの種の鉄鍬が副葬されていた墓葬6基のうち、鉄鍬と鉄鎌が相伴していたのは2基(M108、M217)だけであった。こうした事実は、鉄鍬という道具が淘汰され、農業生産の場から姿を消そうとしていたことを重ねて物語っている。

### 三、鉄製生産用具、鉄製武器及び鉄製馬具：

#### 中国の慕容鮮卑、朝鮮三国時代及び日本古墳時代における 鉄器副葬習俗の一致性と相違性

喇嘛洞発掘報告の付表を見ると、墓16基における副葬品の主要または基本的な部分は、鉄製生産用具(農具や木工具)、鉄製武器及び鉄製馬具で構成されていることが分かる。東アジア地域にまで視野を広げながら喇嘛洞の鉄器について考察し、三国時代の朝鮮や古墳時代の日本で出土した鉄器と大まかに比較すると、すぐ次のことに気づいた。すなわち、喇嘛洞の鉄器と朝鮮や日本の鉄器には、形状、種類、組合せ、及びそれに反映された全体の文化的な面で明らかな一致性が認められる。よって、それら三者を一体にまとめ、4世紀から6世紀の東アジア地域で独自の特色を保っていた完全な鉄器の系統と見なすことには、十分な理由があると言えよう(表二)。その鉄器の系統を構成している主な器種は、それぞれ犁(泥除)、鏝、鋤先(鍬)、鎌、斧、手斧、鑿、刀子などに代表される鉄製生産用具、劍、刀、矛、鍬などに代表される鉄製武器、鞍、鐙、銜(轡)、(帶)金具などに代表される馬具といった3種類の鉄器・16種の代表的な器種である。そこで、それらをまとめて「三鉄十六器の東アジア鉄器系統」と呼ぶこととする。この系統に含まれる鉄器は、すべて副葬品として、当時の墓葬や古墳に意識的に置かれた。したがって、それらに反映された一定の歴史条件下における葬俗や葬制、及び関係する社会、政治、経済や軍事といった面の文化的情報は、他の類型に属する遺跡(城址、住居跡、冶金工房、貯蔵穴など)で散見される鉄器より集中的かつ明瞭であり、研究に値する重要な価値をもっている。この点は、東アジア地域における鉄器の発祥地と言うべき中国・中原地方にある同時代の墓にさえ当てはまらない<sup>19</sup>。そのため、4世紀から6世紀の東アジアにおける鉄器の系統は、あらゆる人類社会が経てきた鉄器時代の中でも重要な位置にある。

表二に列挙されている、一定の代表性をもった朝鮮の墓5基に副葬されていた鉄製生産用具の状況を見ると、鉄製生産用具の基本的な組合せは「鎌・斧・刀子」(表井里、福泉洞)となっている。そのうち相対年代が比較的古いのは表井里の鉄製生産用具であり、その組合せは「鏟・斧・手斧・鏝・刀子」である。相対年代が比較的新しいのは玉田の鉄製生産用具であり、その組合せは「鍬・鏟・鎌・斧・鏝」である。鍬先の数はいずれも少なく、5世紀前半の皇南大塚南墳から出土した14点の「U」字形の鍬先が最も多い例である<sup>20</sup>。これらの墓葬での組合せで構成される朝鮮三国時代における鉄製生産用具の組合せ群は、「鍬・鍬先・鏟・鎌」及び「斧・手斧・鏝・刀子」という2類・8種、つまり2・8型組合せ群となる。

表二に列挙されている、一定の代表性をもった日本の古墳5基に副葬されていた鉄製生産用具の状況を見ると、大阪の黄金塚古墳と岡山の金蔵山古墳の鉄製生産用具が最も代表的なもので、その組合せは「鍬・鏟・鎌・手鎌」及び「斧・鏝・刀子・鋸」である。なお、この組合せは奈良の大和6号墳で出土した各種の鉄製生産用具にも当てはまる(鍬・鎌・斧・刀子)。また、アリ山古墳における鉄製生産用具の「鍬・鎌・斧・手斧・鏝」という組合せ、河内野中古墳での「鍬先・鎌・斧・刀子」という鉄製生産用具の組合せがある。これらの古墳における鉄製生産用具の組合せにより構成される日本の古墳時代における鉄製生産用具の組合せ群は、「鍬・鍬先・鏟・鎌・手鎌」及び「斧・手斧・鏝・刀子・鋸」という2類・10種、つまり2・10型組合せ群となる<sup>21</sup>。

中国の鮮卑、朝鮮三国時代及び日本古墳時代における鉄製生産用具の組合せ群を総合的に比較すると、これら三者は次のような共通点をもつことが分かった。すなわち、「鏝(鍬)・鍬先・鏟・鎌」及び「斧・手斧・鏝・刀子」という8種類の道具が最も基本的かつ主要な鉄製生産用具であり、そしていずれも多かれ少なかれ何種類かの鉄製武器や鉄製馬具(甲や馬甲などを含む)と共伴している。それらは、4世紀から6世紀の東アジア地域における鉄器の系統が、文化全体の様相と一致することを反映している。明らかに、東アジア地域における鉄器の系統は、さらにまた三つの小系統から構成されている。つまり、中国・遼西地区の鮮卑、朝鮮半島の三国時代、日本・九州地方の古墳時代の三つの鉄器系統である。当然、お互いに独立した小系統として、中国・鮮卑の系統は他の2系統との間に、以下のような違いも見られる。

まず、鉄製武器については、鉄鍬に顕著な違いが表れている。喇嘛洞の墓葬から出土した鉄鍬は数が少ないのみならず、その形状も変化が少なく、通常は矛式と鏟式の2種類だけである。朝鮮や日本の鉄鍬は数が多いだけでなく、多様な形状をしている。例えば、日本古墳時代の鉄鍬は、茎部がないか非常に短いもの、茎部があり身部が短いもの、茎部があり身部が長いもの、といった3類に大きく分かれ、10数種もの形状が見られる<sup>22</sup>。また、馬具については、喇嘛洞のM202やM266ではそれぞれ一組の鉄製鞍が副葬されていたが、鉄製鐙は見られない。朝鮮三国時代の馬具については、表井里墓葬、皇南洞109号墳、皇南大塚南墳からそれぞれ鉄製鐙が出土している(表二)。この他、日本古墳時代の短甲にも、喇嘛洞の甲騎具装とは異なる民族色が鮮明に表れている。喇嘛洞と朝鮮及び日本の間で認められる鉄製武器や鉄製馬具の伝播関係から考えて、これらの違いは、東アジアにおける鉄器の系統が絶えざる発展と変化を遂げていく過程で生じた地域的な差異と言えよう。

次に鉄製生産用具について、その主な違いは、中国鮮卑の鉄製生産用具と日本古墳時代の鉄製生産用具の違いであり、この違いは下記2種類の鉄製生産用具で集中的に表れている。

1. 鉄斧：日本古墳時代の鉄斧は鍛造により袋部を作った鉄製生産用具で、その平面形は、一般に長

方形または台形に近いが、一部のものは両肩をもっている。袋部の合わせ目は、閉じているのと、完全には閉じていないものがあり、差込孔が楕円形や「C」形になっている。このような鉄斧の形状は、喇嘛洞M49、M60、M266など7基の墓で出土した斧とは明らかに違うが、M101から出土した鉄製手斧に似ている。この手斧の平面は台形に近く、刃が平らで、袋部の合わせ目は閉じているが、鍛造接合の継目も見られる(図二、図版15-4)。

表一に列挙されている報告によると、中国の慕容鮮卑、朝鮮三国時代、日本古墳時代の鉄製板状の叩き切る道具が、すべてまとめて「斧」とされている。しかし実際には、慕容鮮卑の斧は、朝鮮や日本のものと形状が大きく異なっている。慕容鮮卑の斧は、鑄造部分と鍛造部分を併せ持っているが、すべて背部が平らで刃は弧を描いているうえ、背部付近の両側に柄を通す長方形の差込孔が横向きに貫通しており、一般に「扁孔斧」と呼ばれている。この差込孔が貫通する方向は刃と平行になっているため、この種の斧は刃を縦方向にして叩き切る以外にない。一方、朝鮮や日本の斧は、すべて鍛造されていて縦型の袋部をもち、刃に対して差込孔が直角に向いており、一般に「鍛造袋部鉄斧」や「C形袋状鉄斧」と呼ばれている。明らかに、このような鍛造袋部鉄斧に柄を装着する方式は確定できない。つまり、鉤状の木柄に直接差し込む以外に、木柄の先端に木の楔を打ち込み、さらにその楔の先端に鉄斧を装着することも可能である。こうして、斧の刃と柄を平行にすれば斧として使え、斧の刃と柄を垂直にすれば手斧としても使用できる。朝鮮の楽浪漢墓(前漢の後期)と茶戸里1号墳(紀元前1世紀の後半から紀元1世紀)で出土した木柄付きの鉄斧や鉄製手斧は、その典型的な例と言える。そのうち、茶戸里の鉄製手斧は、鉤状になった木柄の先端を直接に袋部へ差し込んだものである(図三)。中国では、漢代に鑄造された縦形袋部の鉄斧と鉄製手斧の形状は基本的に同じであり、大きさが少し違うだけで、両者の機能も同じであったことが考古学的発見により確定されている<sup>23</sup>。一方、日本では、今までに木柄が装着された鍛造袋部鉄斧の実例はまだ発見されていないようである。山梨県中道町の大丸山古墳では、鉄製で曲がった柄をもつ鉄斧(報告書では「有柄鉄斧」としている)も出土しているが、それは4世紀から5世紀の遺物であった<sup>24</sup>。ただ、少し驚かされることに、その鉄斧の形状は、河南省洛陽市の伊川で出土した前漢の曲頸(または「鶯頸」)式鉄製礪鋤(頸が曲がった鉄製手斧)とよく似ている。特に、湖北省棗陽市で出土した前漢の曲頸式鉄製手斧と比べると、非常によく似ている(図四)<sup>25</sup>。

朝鮮三国時代と日本古墳時代では、大量にこの鍛造袋部鉄斧が使用されていたが、この状況とは反対に、漢・魏時代の中国ではあまり使われていなかった。研究によると、このような鍛造袋部鉄斧は、河南省輝県固圉村や遼寧省旅順南里からも出土しているが、その年代は紀元前4世紀末から紀元前3世紀初頭の戦国時代後期まで遡る。それは、袋部の鍛造技法により、鑄造製の同種の鉄製生産用具が持つ縦形袋部を模倣した産物と思われる<sup>26</sup>。朝鮮半島では、この種の鉄斧で年代が最も古いのは、済州島の龍潭洞遺跡で出土したものである。この鉄斧の年代は、紀元前2世紀の無文土器とともに出土したため、漢が楽浪等の郡県を置いた年代以前まで遡る<sup>27</sup>。また、日本列島において最も古いのは、福岡県吉浦遺跡から出土したもので、弥生時代中期前葉(紀元前1世紀頃)の遺物である<sup>28</sup>。したがって、空間からみても時間からみても、このような鍛造袋部鉄斧は、中国の中原地方から朝鮮半島を経て日本へ伝わったものとすべきである。

これと比較して、長方形の孔が貫通した鉄斧が出現した年代は、鍛造袋部鉄斧よりかなり遅れる。河南省洛陽市焼溝漢墓(前漢の中期から後漢の後期)で出土したものが、比較的古い年代の例として挙げられるであろう<sup>29</sup>。その形状の特徴を見ると、明らかに鉄の冶金・鑄造技術が成熟した後の産物である。

この種の鉄斧は、それまでの袋部に代わって、斧身を横方向に貫く長方形の孔となっているため、柄を堅牢かつ容易に装着できるうえ、物を叩き切りやすくなっている。さらに、斧身は重く、斧の背も平らなので、金槌としての使用も可能である。これらの長所をもっているため、この種の長方形の孔が貫通した鉄斧は、漢代に生まれてから近現代に至るまで、ずっと2000年以上も使用され続けている。今もよく見られる大工用や消防用の斧の形状は、これと比べてほとんど同じで、その生命力の強さが充分に分かる。

喇嘛洞の報告に列挙されている16基の墓葬のうち、7基の墓葬でこの斧が副葬されていた。よって、この長方形孔の斧は、4世紀の中国鮮卑社会での生産活動において、すでに広く使用されていたと思われる。ひいては高句麗の鉄製生産用具にまで影響を与えたといえよう<sup>30</sup>。事実、紀元前1世紀の韓国慶州市九政里遺跡から出土した鉄器のなかには、すでにこの長方形孔の斧が鍛造袋部の鉄斧と相伴している例も見られる<sup>31</sup>。しかし、この種の斧が鍛造袋部の鉄斧とともに東の日本へと伝わることは、終になかった。その原因は、当時の日本の鑄鉄技術の限界かもしれない。さらに可能性があるのは、材料(鉄)の使用量を節約しながら簡単な工程で製作するうえ、また違った方法で柄を装着し、斧と手斧の機能を兼ね備えさせた鍛造袋部の鉄斧がすでに広く普及していた状況のもとで、当時の日本では、この長方形孔の斧に対する需要がなかったと考えられる。換言すれば、鍛造袋部の鉄斧を大量に使っていたのは、鉄の鑄造技術がまだ未発達なうえ、その原料供給源も限られている歴史的条件下にあった弥生・古墳時代の日本で、大量の木材を加工する需要に適応し満足させるため、特に弥生時代に木製農具を製作する需要を満たすための必然的な選択だったのである。

2. 鉄鋏先：喇嘛洞の報告に列挙された16基の墓葬のうち5基で、この鉄器が副葬されていた。そのうち4点は「凹」字形をした鑄造製である。それらは典型的な漢代の様式の農具であるが、秦代以前における青銅製生産用具の遺風も残している。この種の鉄鋏先は、朝鮮半島の古い時代に使われていた鉄製生産用具を見ても、非常に少なく、ただ虎谷遺跡17号住居址や楽浪漢墓から少数が出土したのみであり、それも中国人が使っていたものを持ってきたものと思われる。また、「凹」字形の鉄鋏先が中国から次第に姿を消すころ、朝鮮半島では反対に「U」字形の鉄鋏先に変わっていった。ソウル九宣洞で出土した4点の鉄鋏先と皇南大塚南墳で出土した14点の鉄鋏先は、その実例である<sup>32</sup>。おそらく技術的条件による制約と思われるが、三国時代の朝鮮では、この種の鉄鋏先を使用していた数量や範囲が大きくなり、日本へ伝えられたのも少なかった。また、弥生時代の日本では、鑄鉄技術と鉄の原料供給源という二重の制約を受ける状況のもと、鍛鉄技術を当時広く使用されていた木製農具と実際に組合せ、鑄造の「凹」字形の鉄鋏先とは形状が異なる、大量に作れて簡単かつ実用的な方形板刃先の鉄鋏先を生み出した。それは、日本古墳時代における鉄器系統の中で独自の特色を備えた鉄製生産用具の一つとなった(表一)。

形状から見ると、このような方形板刃先(日本の報告書で「刃先」となっている)の鉄鋏先は、実際には、鍛造した長方形の鉄板の両端を同じ面の内側に曲げ、それを木製鋤・鋏の刃部の「装着部」へ取付けるようにしたものであり、その平面はほとんど長方形であるが、中には台形や扇形のものも見られる。これまでの研究によると、日本では、遅くとも2世紀初頭にはそれが出現しており、3世紀頃から次第に増えていった。その製作技術の源流は、弥生時代の「凹」字形青銅製鋏先(つまり銅刃先)やC字形袋状鉄斧(つまり鍛造袋部鉄斧)と関連する<sup>33</sup>。しかし、一定の文化交流を背景とした技術革新の一般的な過程において、こうした革新には外来技術の影響や啓発が不可欠であり、日本の伝統技術という

基盤も切り離すことができない。弥生時代においては、青銅製鉄先かC字形袋状鉄斧かを問わず、すべて必ず中国の金属製工具の伝搬者や影響が関係している。仮にこれが方形板刃先鉄鉄先を生み出した「外因」であるとする、それを生み出した「内因」も存在するはずである。その内因とは他でもなく、弥生時代では大量の木製農具を製作・使用する必要があったことである<sup>34</sup>。九州地方で出土した鉄器の種類について、弥生時代の前期から後期までの変化を見ると、鉄器による石器の代替は、斧、手斧、刀子といった木工具から始まっている<sup>35</sup>。こうした変化も、やはり当時、大量の木製農具を製作する必要があったことと無関係ではないといえる。したがって、このような方形板刃先鉄鉄先が生み出された原因については、次のように解釈すれば、より妥当であろう。すなわちそれは、弥生時代後期の工人たちが、鉄の原料が不足している条件下で、大量の木鋤や木鋏に薄く広い刃部を「装着」という問題を解決するため、袋状鉄斧のC字形袋部を鍛造する技術を参考にしながら創り出した、鍛造の鉄製品のひとつだったのである。仮にこうした方形板刃先鉄鉄先がC形鍛造袋部を横に広げた形とみると、その「窄めた」形はC字形鍛造袋部とさほど大きな違いがないことは容易にわかる。したがって、方形板状の鉄鉄先という平たく広い「装着部」から見れば、このようなC字形の鍛造袋部とは、単に丸めて短くした「装着部」に相当するものに過ぎない。

5世紀以降、古墳時代の日本では、引き続きこうした方形板状の鉄鉄先が大量に用いられたが、この頃には、朝鮮に続いて「U」字形刃先の鉄鉄先も現れた。この鉄鉄先も、やはり、明らかに中国漢代の「凹」字形鉄鉄先による影響を受けたものである。喇嘛洞で数多くの「凹」字形鉄鉄先が出土したことも、そうした影響が持続的にあったことを示している(表一)。ある見解によれば、この「U」字形鉄鉄先は、古墳時代の中期にひとたび現れると急速に普及し、「一」字形や「凹」字形の鉄鉄先に代わって、当時の中心的な鉄製農具になった、とされている<sup>36</sup>。しかし、表二に挙げられたいくつかの重要な古墳から出土した鉄製生産用具からは、それほどまでに普及した形跡が伺えない。これに反して、古墳時代中期・後期の大規模な古墳に副葬されていた鉄製生産用具を見ていくと、弥生時代中期に創り出された方形板状の鍛造鉄鉄先が、依然として当時の主要な鉄刃付き農具の一つである。「U」字形鉄鉄先の形状を観察すると、鍛造・鑄造に関わらず、製作工程において、方形板状の鍛造鉄鉄先よりも複雑なだけでなく、明らかにより多くの鉄材を消費する。しかも、大量の鉄材や先進的な鍛造技術を優先的、あるいは主として軍事物資の生産に利用していた古墳時代において、当時の大和王朝や地方の豪族が、軍事物資に必要な鉄材や労働力を割いて、生産用具である「U」字形鉄鉄先を大量に作らせるであろうか。これは大いに疑問に値する点である。このことを考慮し、この「U」字形鉄鉄先が日本で現れたのを、朝鮮三国時代の鉄器及びその製作技術が伝えられた結果とすると、正確に言えば、「U」字形鉄鉄先は、もともと朝鮮半島南部の伽耶諸国にいた「渡来人」の集団(工人と家族を含む)が日本に移住した後の産物、というのが大方に認められる見解である<sup>37</sup>。この「U」字形鉄鉄先の供給が、当時の日本において「地元産」ではなく、まだ「舶載品」に属していた以上、急速に普及して他の鉄鉄先にとって代わる実力は備わっていなかったと思われる。

付記：本稿の執筆に際しては、日本の奈良国立文化財研究所から関係する発掘報告書(日本語)の寄贈を受け、遼寧省博物館の姚義田氏に翻訳の協力を得た。ま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の白雲翔氏からも関係する論文や資料が提供された。ここに併せて感謝の意を表する。

註

- 1 遼寧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遼寧北票喇嘛洞墓地1998年發掘報告」『考古學報』2004年第2期。
- 2 喇嘛洞の發掘報告における元の合計数は75点であったが、ここでは本稿の執筆に際して改めて行った合計数に準拠する。
- 3 喇嘛洞の報告書の「穿」は他の概報に関連して使われていた名称を援用したものであるが、実際は「鑿」とするのが望ましい。王成生による文(註9)を参照すること。ここでは、それに基づいて修正した。
- 4 白雲翔「新石器時代墓葬中隨葬労働工具の考察——以黄河中游地区為例」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編：『考古求知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4月第1版。
- 5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滿城漢墓發掘報告』文物出版社1980年10月第一版、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江西新干大洋洲商墓發掘簡報」『文物』1991年第10期を参照
- 6 筆者は、他のテーマを研究するため全国125カ所の比較的重要な古代遺跡や墓葬から出土した古代金属製工具の状況に関する統計を行った。そのうち墓葬(群)は46カ所で約36%を占め、多くは湖南、雲南、四川、広東の4省に集中していた。
- 7 『後漢書・烏桓鮮卑列伝』卷九十。「烏桓」は「烏丸」とも書き、『三国志・烏丸鮮卑列伝』卷三十の裴末による注記でも同様の記載が見られる。
- 8 「ツールキット(Tool-kit)」という概念は、アメリカの「新考古学」を代表する人物であるルイス・ビンフォード(Lewis Binford)が提唱したものである。これは、特定の専門的な目的のために作られた機能を組合せた道具一式を指す。例えば、先端が尖った木の棒、叩く(断ち切る)道具、すり盤、すり棒などを集めて道具一式とする。馮孟欽の『嶺南の中石器時代のツールキットに関する概略的な分析』、及び英徳市博物館等編の『中石器文化及びそれに関する問題のシンポジウム論文集』(広東人民出版社、1999年12月第1版)を参照。「ツールキット」と異なるのは、本稿の「鉄製生産用具の組合せ」強調されるのが、同じ遺跡単位内に副葬された各道具の共伴関係である点である。
- 9 「鉄製生産用具の組合せ群」という言葉の「群」は、文化学における「文化群」という専門用語を参考にしたものである。いわゆる「文化群」は、「文化の特性群」、「文化の集合群」、「文化の複合」などとも言われ、時空の中で一つの単位として持続的に存在している「機能が整合された特定の文化的な特性」を指す。覃光広等主編の『文化学辞典』第117頁(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8年8月第1版)、『社会科学大詞典』第344頁(中国国際放送出版社、1989年10月第1版)、『辞海』(下)第4,371頁(上海辞書出版社、1999年9月第1版)などを参照。本稿での「群」は、語義上で英語の「Cluster」に相当する。
- 10 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榆樹老河深』文物出版社1987年4月第一版。
- 11 張柏忠「科左后旗呼斯淖契丹墓」(原文中の矛は、四稜体とあることから鑿である)『文物』1983年第9期。苗潤華「巴林右旗老房身金代窖藏」『遼海文物學刊』1994年第1期。劉謙「遼寧錦州市張杠村遼墓」『考古』1984年第11期。王成生「遼寧朝陽市遼劉承嗣族墓」『考古』1987年第2期。朝陽地区博物館「遼寧朝陽姑営子遼耿氏墓發掘報告」『考古學集刊』3、1983年。別に吉林德惠后城子金代の遺跡からも出土している。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吉林省近十年的文物考古工作」(文中「氷を砕く」とある)『文物考古工作十年』文物出版社1991年1月第一版。
- 12 黎瑤渤「遼寧北票県西官営子北燕馮素弗墓」『文物』1973年第3期。そのなかに鏝の図はない。報告の記述によると鍛鉄鏝で、あるいは、喇嘛洞M266出土の鏝に類似する。鏝と鋸の写真は遼寧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三燕文物精粹』105頁、図131-133、遼寧人民美術出版社2002年1月第1版を参照。
- 13 遼寧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五女山城—1996~1999、2003年桓仁五女山城調査發掘報告』文物出版社2004年6月第一版。
- 14 李京華「渾池県発現的古代窖藏鉄器」『文物』1976年第8期。
- 15 註5。他に陝西省博物館等「陝西省発現的漢代鉄鏝和鏝土」『文物』1966年第1期。
- 16 陳文華『中国農業考古図録』(江西科学技術出版社1994年12月第1版)242頁図2-405(河南三門峡唐代鉄鏝)、243頁図2-413(河南洛陽北宋鉄鏝)、244頁図2-423(遼寧阜新遼代鉄鏝)、246頁図2-431(河北豊寧金代鉄鏝)。

- 17 註16、296頁図 2-606、297頁図 2-613。
- 18 註16、289頁図 2-570(湖北盤竜城青銅鑿)、290頁図 2-575(陝西宝鷄西周青銅鑿)。
- 19 註 6 の統計資料による。
- 20 王巍『東亜地区古代鉄器及冶鉄技術的伝播与交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 2月第 1 版。関係する朝文の報告は以下を参照。伊東錫『三国時代鉄器遺物の金属学研究』。釜山大学校博物館『東萊福泉洞古墳群』I、1983年。趙榮濟等『宜寧礼屯里古墳群』慶尚大学校博物館、1994年。趙榮濟等『陝川玉田古墳群Ⅱ M3号墳』慶尚大学校博物館調査報告』第六輯。文化財管理局『慶州皇南洞第九十八号古墳(南墳)発掘報告』1976年。
- 21 註20。関係する日文の報告は以下を参照。梅原末治『椿井大塚古墳』『京都府文化財調査報告』第22冊、1964年。末永雅雄等『和泉黄金塚古墳』『日本考古学報告』第 5 冊、1954年。尾崎喜左雄「後閑天神山古墳」『前橋市史』第 1 卷、1971年。北野耕平『野中アリス古墳』『大阪大学文学部国史研究室研究報告』第一冊、1964年。北野耕平『河内野中古墳の研究』同第二冊、1976年。末永雅雄等「宇和奈辺陵墓参考地陪塚高塚一大和第 6 号墳」『奈良県史蹟名勝天然記念物調査抄報』4、1950年。
- 22 王巍『東亜地区古代鉄器及冶鉄技術的伝播与交流』254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 2月第 1 版。
- 23 李京華「河南古代鉄農具」一文中国図六一『農業考古』1984年第 2 期を参照。
- 24 東京国立博物館『日本の考古』108頁挿図、1999年。
- 25 註16、275頁、図 2-532と図 2-533。日本鉄斧の装柄復原図は埼玉県立さきたま資料館『さきたま』14頁挿図、2002年を参照。このほか、日文中の「有柄鉄斧」の発音(ゆうへいてつぶ)と中国語は非常に近く、これもまた、語源上の証拠であろうか。
- 26 白雲翔「戦国秦漢和日本弥生時代の鍛造鉄器」『考古』1993年第 5 期。
- 27 註26。
- 28 註26。
- 29 註26。他に洛陽区考古発掘隊『洛陽燒溝漢墓』科学出版社1959年12月第一版。
- 30 徐家国等「遼寧撫順高爾山城発掘簡報」『遼海文物学刊』1987年第 2 期。
- 31 李南珪著、趙志文訳「朝鮮半島初期鉄器文化的形成和発展過程」『華夏考古』1996年第 1 期。
- 32 註22、97頁。
- 33 白雲翔「弥生時代の鉄刃先及相關問題」『先史学・考古学研究』第 2 号(1991)、筑波大学。
- 34 劉小燕「日本弥生時代の農具」『農業考古』1988年第 1 期。
- 35 王巍「弥生時代鉄器及制作技術研究」『望遠集』(下)、陝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12月第 1 版。
- 36 註22、137頁。
- 37 註22、139頁。

\* 原文は「削」である。削は、一般に刀の一種とされ、刀子のほかに小刀も含まれる。ここでは、手工用の工具ということで、刀子と表記した。



【図出典】

1. 喇嘛洞出土鉄器の図は、複写したもののほかは、『考古学報』2004年第2期、図15・16
2. 河南滎池出土鉄器の図は、『文物』1976年第6期
3. 遼寧五女山出土鉄器の図は、『五女山城—1996～1999、2003年桓仁五女山城調査発掘報告』遼寧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2004年、p.169図180、p.240図243
4. 朝鮮出土鉄器は、王巍『東亞地区古代鉄器及冶鉄技術伝播与交流』p.84図29、p.92図33
5. 日本出土鉄器は、『河内における古墳の調査』『大阪大学文学部国史研究室研究報告』第一冊、p.151第80図、『河内野中古墳の研究』『大阪大学文学部国史研究室研究報告』第二冊、p.128第71図、p.134第72図

表二 中国、朝鮮三国と日本古墳時代の古墓葬、古墳鉄器副葬品簡表\*

出土地点	年代	鏝	鋤先	鎌	鍬	斧	手斧	鑿	削	其他	劍	刀	矛	鏃	鐙	銜	帶具	其他	註	
中国	喇嘛洞ⅡM49	3世紀末	1		2	1			1	犁1	1	1	2	2			1		1	
	喇嘛洞ⅡM60	同上	1	1	1					穿孔具1	1		1						1	
	喇嘛洞ⅡM101	同上		1	1		1		1		1				1	1	2	轆2(木心銅張)	1	
	喇嘛洞ⅡM196	同上			1		1		1	穿孔具1、又鍬1	1		2		1	5			1	
	喇嘛洞ⅡM202	同上									1			2	1	4			1	
	喇嘛洞ⅡM209	同上	1	1	1	2				犁1、穿孔具1	1	1	2	2					1	
	喇嘛洞ⅡM217	同上			1	1	1						1	△		1	6		1	
	喇嘛洞ⅡM266	同上	1	1	1	1	1	1	1	犁2、泥除2	1	1	2	△	2		△	鐙2(木心銅張)	1	
	表井里墓葬	4世紀			✓	✓	✓	✓	✓			✓			28	✓				20
	皇南洞109号墳	4世紀後半	✓		✓	5		1					3	8	1000	2	4	轡1、甲冑	20	
朝鮮	皇南大塚南墳	5世紀前半	✓	14	✓			42	42	鍬先20、鉄鏈1332			599	42	10			轡4、杏葉	20	
	福泉洞22号墳	5世紀		1	✓	1		16		鉄鏈20		3	13					甲冑、馬具	20	
	玉田3号墳	6世紀初	✓		✓	✓	✓			錘、鑿		✓		200	✓	✓		馬冑、杏葉	20	
	椿井大塚山古墳	3世紀後半			3	10		31			10	7	71	113				甲冑各1	21	
	大阪黄金塚古墳	4世紀後半	✓	2	✓	7	✓	3	6	手鎌2、鋸1	22	14	1	1542				短甲1	21	
日本	大阪アリ山古墳	5世紀			201	✓	✓	90			✓	✓	9	63					21	
	岡山金藏山古墳	同上	✓		19	✓	48	50		手鎌30、鋸9	✓	✓	✓	740				短甲片	21	
	大阪野中古墳	5世紀後半		11	2	30		2		手鎌35、鋤4	16	153	3					短甲8、付冑8	21	

\*表中の年代は、すべてその下限の年代である。鏝には鋸、削刀には小刀が含まれる。鏝、鍬、斧の合計は、それぞれ皇南大塚380点、大阪黄金塚18点、金藏山古墳40点である。その他、「✓」を付したものは点数不詳、「△」を付したものは錆びや欠損が著しく、点数も不詳である。